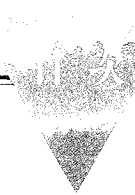


小川尚義與高本漢 漢語語音研究之比較

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

洪惟仁*



一、提要.....	26
二、前言.....	26
三、論文內容之比較.....	35
四、學術地位之比較.....	59
五、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	69

一、提要

高本漢於1915~26年發表了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的論文，這篇論文比較了三十三點的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並進一步擬測了中古漢字音音值。1940年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參照高本漢後來的修正，譯為中文，題為《中國音韻學研究》，對漢語音韻學、方言學造成極大的影響，在漢語語言學史上獲得極高的評價。

然而類似的工作在漢語語言學史上高本漢並非第一人，早在1907年，小川尚義即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作廣泛的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並擬測了中古聲母、韻尾的音值，在若干方面得到更合理的結果。

小川尚義的目的，是爲了呈現閩南語在漢語中的音韻特徵，因而作了廣泛的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比較，爲了理解今音分歧，而作了一些中古漢字音的擬音工作；而高本漢的目的，主要是中古漢字音的擬測，作爲擬測的基礎工作，他作了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調查、描寫、比較。因爲目的不同，因此工作的重點和處理方式也不同，但他們卻都作了類似的工作。

由本文的比較可知，就研究方法而言，高本漢比小川尚義精密而嚴謹，尤以對漢語方言廣泛的調查、描寫，更是小川尚義所不及；但就成果而言，小川尚義也有超過高本漢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小川尚義是漢字音比較研究的開拓者。因此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該也有他的地位，可是高本漢在漢語音韻學及漢語方言學界，被公認爲偉大的開拓者，然而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界毫無名氣，在漢語語言學史上也毫無地位，這是爲什麼？

本文的目的是比較小川尚義和高本漢的研究成果，並從漢語語言學史的觀點分析兩人的名氣與地位何以有這樣天壤之別的原因。

二、前言

(一)學術背景之比較

小川尚義(1869~1947)：日本人，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畢業。台灣總督府編修官，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漢語學家、閩南語學家、南島語學家，編過大量閩南語辭典、做過普遍的台灣南島語調查。

高本漢(1889~1978)：瑞典人，Upsala大學博士。Göteborg等大學教授、

校長，做過廣泛的漢字音調查、比較，擬測漢語古音，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開拓者，同時也是中國古物學家、小說家。

1. 小川尚義小傳

小川尚義(Ogawa, Naoyoshi)明治二年二月九日(新曆1869年3月21日)出生於日本四國島伊予國溫泉郡，為丹下尚逸ムラ之三男，明治五年(1872)五月過繼給松山御寶町小川武一為養子。經松山中學校、第一高等中學校，1895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¹⁾畢業。「博言學」是語言學的舊稱，日本現稱「言語學」。畢業論文指導教授是堪稱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的上田萬年，⁽²⁾上田留學德國，專攻歷史比較語言學，1894年回母校任教，擔任語言學教授，一生奉獻於語言學教育，培養許多語言學人才，他在日本語言學界的地位略當於中國的趙元任。初期的博言學科除引進歐洲語言學之外，著重日本語言文字問題、東洋諸語的研究。博言科培養的學生後來在日本語、愛奴語、琉球語、朝鮮語、阿爾泰語、漢語、台灣語、南島語、俄語等都有專家。小川尚義是上田萬年回母校任教所培養的第

-
- (1) 東京帝國大學是現在東京大學的前身，原名東京大學，1886年改為分科大學，同年其文科大學並於原有的哲學、和文、漢文三學科(學系)之外，增設博言學科(語言學系)，第一任語言學教授是英人 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氏任教五年離職，其得意門生有上田萬年。繼任的語言學教授有 Karl Adolf Florenz、神田講師、上田萬年教授等。博言學科除引進歐洲語言學之外，著重日本語言文字問題、東洋諸語的研究。初期畢業生爾後有成就者可舉小川尚義(漢語、台灣閩南語及南島語)、金澤庄三郎(朝鮮語)、藤岡勝二(阿爾泰諸語)、新村出(日本語)、八杉貞利(愛奴語、俄語)、橋本進吉(上代日本語)、依波普猷(琉球語)、金田一京助(愛奴語、日本語)。博言科設立伊始即開有「支那語(俗語)」，教授北京口語。1899年博言學科改為言語學科。參見《上田萬年語言學》序文、六角恆廣(1984版，頁53~54)、長志珠繪(1993.10)、田中秀夫(1969.1)。
- (2) 上田萬年(Ueda, Kazutoshi 1867~1937)日本江戸人，1888年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和文科畢業，旋入大學院，1890年奉派赴德國柏林大學、來比錫大學學習語言學，曾師事青年文法學派 G. von der Gabelentz 學印歐比較語言學、「國語運動」，經三年半，1894年6月回國，7月為文科大學教授，教授語言學。時年29歲。其門生有小川尚義、新村出、保科孝一、時枝誠記等名語言學家。1974年柴田武整理新村出的筆記編為《上田萬年語言學》，是日本最早的語言學概論。上田專攻歷史比較語言學，其論文以1898年運用歷史語言學原理發表〈p音考〉，論證日本語ハ行p→h的變遷一文最有名。1899年獲文學博士。1897年開設「語言研究室」，至1927退休培養很多語言學人才。《上田萬年語言學》筆記中曾提到一句話：「日本支那語的研究不振……竊嘆今日之漢學者但以儒教為中心，語言、文字則無人研究。」也許因為他的鼓勵激發小川尚義對漢語的研究興趣。上田的語言觀屬於強烈的國家主義，又強烈主張文字改革，如廢漢字或限制漢字字數、採用羅馬字或改革假名等，對日本國語的推行、文字改革影響極大。曾任國語調查委員會主查委員、文科大學學長。參見《上田萬年語言學》序文及野村雅昭、小池清治《日本語事典》、石剛《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1993)。

一個高足，也是唯一的漢語、台灣閩南語、南島語的專家。

1896年小川尚義即將畢業的那年春天，上田先生對小川尚義說：「今年七月你就要畢業了，要不要去台灣看一看？台灣的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先生爲了編台灣語、蕃語的字典，招聘一名專攻語言學的青年。」小川尚義本來就認識到台灣語言的研究，對研究漢語及南島語的重要性，所以當下欣然承諾。7月回故里，由於年初台灣發生芝山巖事件，有六位日本人教師（所謂「六氏先生」）被殺，兄弟都替他擔心，但小川仍決意前往。

台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留學過美國，曾在電話發明人貝爾門下學過發音學、音標。他是日本漢語學界第一個，也是戰前日本漢語學界略具西方語音學的方法以研究北京話的學者，曾以修改的假名符號正確的標注北京話，著爲《日清字音鑑》，這是日本第一部北京話的標音韻書，他所用的符號也可以說是中國「國語注音符號」的先驅。1895年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戰敗，台灣割日，伊澤拿著這本《日清字音鑑》的原稿，毛遂自薦地晉見內定爲第一任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大論台灣教育，樺山當場邀請他擔當開創台灣教育之任。6月，伊澤帶著百餘名懂得北京話的陸軍通譯抵台北，他起先誤以爲台灣既爲清國之地，當然通行中國的官話——北京話，晉見樺山時出示《日清字音鑑》即出於這個誤會，沒想到當時台灣沒有人懂得北京話。伊澤乃開始研究台灣話，編輯會話課本、台灣《十五音》、台灣話字典等，對日本人官吏、教師進行台語教育。台灣話的假名注音符號，即以《日清字音鑑》的假名符號加以修改而成。⁽³⁾伊澤由此深切地了解到研究台灣語言、編纂台灣語辭典的重要，乃透過上田萬年的介紹找到小川尚義。

(3) 伊澤修二(1851~1917)生於日本信濃國依那郡高遠城下(今長野縣高遠町)。幼從外祖父讀書、寫字，稍長入藩塾，以學才拔群，舉爲察長。當時西方勢力直逼東亞，伊澤乃在鑽讀漢籍之餘，也勤讀翻譯洋書。1867年輟轉江戶、京都之間，開始自習英語，旋入蘭學塾學蘭學。1868年明治維新，伊澤上東京從中濱萬次郎、美國傳教士李爾學英語，1870獲選爲朝廷諸藩貢進生入大學南校，1875年任官立愛知縣師範學校長。

1876年奉派赴美考察師範教育，入麻薩諸塞州立橋水師範學校就學，受業於電話發明人貝爾學習「視話法」。所謂「視話法」，伊澤又譯爲「萬國普通音字學」或「生理的音字學」，就是研究人類發音原理，創制音標標示各種音值的學問，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語音學」或「發音學」。後來伊澤運用這種「視話法」從事漢語教育的研究、聾啞教育、口吃矯正。1877年師範學校畢業，旋入哈佛大學學理學約一年，1878年5月回國，任教於東京高等師範，1879年昇爲校長，1881年轉任文部省少書記官，1885年昇爲大書記官，同年底昇爲新內閣文部省編輯局次長，翌年3月昇局長。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教育思想界發生了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論戰，伊澤乃於1890年發起創立「國家

1896年9月伊澤回日本招考第二回講習員，10月召見小川，兩人談起漢語音韻，十分投機，小川告訴他「要把一生奉獻給台灣」，果然小川終其一生，都在台灣進行台灣語言的調查、研究。

小川於同年12月渡台，在學務部編纂課當一名囑託(即特約雇員)，課長神津仙三郎。神津曾留學美國阿爾巴尼州立師範學校，1878年回國任師範學校教授。1896年4月渡台任學務部囑託，後昇任課長。1897年因腸加答兒病去逝。任內即開始積極進行台語研究，曾翻譯馬約翰的《英廈辭典》，準備編纂日台對照辭典，可惜只譯了一半便去世了。這項任務從此交給小川尙義。

小川尙義是日本領台期間，對台灣語言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一位語言學家。他一生擔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的編修官，主要的任務是編纂台灣話辭典，舉凡總督府所有辭典的編纂的工作，幾乎都在他的主持下完成，如《日台小字典》(1898)、《日台大辭典》(1907)、《日台小辭典》(1908)、《台日大辭典》(1931~32)、《台日小辭典》(1932)、《新訂日台大辭典》(1938，上卷)。這些字典不但部數多、部頭大，而且品質高。這些辭典的編纂，不是小川這樣學術基礎深厚、並且具有堅強毅力的人不可能辦到。

教育社」以宣揚國家主義教育。伊澤被選為社長，旋創辦《國家教育》雜誌。1891年伊澤下野，專心於國家教育社之事業。

1895年伊澤以修改的假名符號正確的標注北京話著為《日清字音鑑》，這是日本第一部北京話的標音字典，他所用的符號也可以說是中國「國語注音符號」的先驅。同年5月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戰敗，台灣割日，伊澤拿著這本《日清字音鑑》的原稿毛遂自薦地晉見內定為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大論台灣教育，樺山當場邀請他擔當開創台灣教育之任。伊澤赴任之後即著手研究台灣話，編輯會話課本、台灣《十五音》、台灣話字典，對日本人官吏、教師進行台語教育，對台灣人進行日語教育，奠定台灣殖民地教育基礎。1897年伊澤辭職歸日，同年敕選為貴族院議員。

1899創立泰東同文局專門編纂出版中國關係的圖書。1905年在他的監修下由泰東同文局編撰出版了《東亞普通讀本》六冊；1908年在他的監督下由漢字統一會編纂出版了一部日本吳音、漢音、韓國音、北京音的對照字典《同文新字典》。

1903年在東京小石川自宅創設「樂石社」，1907年創立「樂石學院」進行語言教育的研究與實驗，如日本國內的方音矯正、外語(特別是華語)教育的發音矯正、口吃矯正、對台灣人的日本語教育。

1895年《日清字音鑑》出版之後對當時以實用、速成的日本華語教育界並沒有什麼影響。但是台灣話的假名注音符號却是以《日清字音鑑》的假名符號加以修改而成的。不過伊澤對他所創的假名式注音符號並不滿意，十年之後的1904年參照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採和假名符號創制了一種諺文式的方塊拼音字母，出版了《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解說書》。1915年著《支那語正音練習書》及《支那語正音發微》，1916年出版《視話應用支那語正音韻鏡》，華語的注音都採用他的字母。參照六角恆廣《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1961)、村上嘉英《伊澤修二のこと》(1973)、埋橋德良《伊澤修二の中國語研究》(1991)、洪惟仁《日據時代的台語教育》(1992)。

小川尚義任職總督府期間，除了總督府的職務之外又兼任國語學校教授，一度任台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台北帝國大學創校之後，1930年小川應聘為語言學教授，兼任總督府囑託，時年已六十二歲。在總督府的委託下，小川編輯了《排灣語集》(1930)、《泰雅語集》(1931)、《阿美語集》(1933)。小川在總督府時代已著手研究台灣南島語，應聘為台北帝大教授之後，更潛心於南島語的調查、研究，任教期間接受上山滿之進總督捐出各方贈送的餞別金，與淺井惠倫等合作進行南島語的調查、研究，一年有半年待在山地。1935年以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的名義發表《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6年獲學士院恩賜賞。小川一生淡薄名位，對博士頭銜也不感興趣，但因恩賜賞乃是「天皇所賜」，著新衣欣然接受。

同(1936)年春，小川已告老還鄉，回松山市出淵町養老。歸老後的小川仍為1938年出版的《新訂日台大辭典》校對，並繼續進行南島語研究，發表了五篇傑出論文。1947年10月21日小川在故鄉的松山市逝世，享年79歲。⁽⁴⁾小川一生的研究生涯與日本據台相始終。他孜孜矻矻為台灣語言的研究奉獻一生，但他淡薄名利，雖然著書很多，幾乎沒有一部著作是用他的名義出版的。前述台語辭典的編纂者都是「台灣總督府」，《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是以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的名義出版，如果沒有編輯說明或序言，小川尚義的業績將被掩沒。

(4) 有關小川尚義的事跡參見馬淵東一(1948)、村上嘉英(1966)、(1989.2)、小島武味(1981)、洪惟仁(1992.9)、Doi(1976)、黃秀敏(1994.5)、酒井(1994.8)。1994年1月23日筆者在田中哲郎先生的陪同下，前往日本靜岡縣濱松市拜訪小川尚義次男小川次郎醫師，時小川醫師已八十二歲，對先父的記憶亦不多，這些記憶也可能有誤，附記一二於此，聊備參考而已。

(a) 小川中學畢業後，入東京第一高中，後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在東京時住久松在東京為收容松山同鄉子弟特別設立的學生寮，久松是松山的「殿様」(大名)。小川在那兒認識了俳句詩人正岡子規，兩人交往的書信藏於松山市的「子規會館」。

(b) 小川在東京就學中曾因腳氣病休學回家鄉養病，約一、二年時間。(依酒井，小川於1890年4月腳氣病治癒回東京一高復學，受松山同鄉的勸誘入基督教講習所，受教於德國牧師スピネル，始信基督教。但小川並不屬特定的教派或教會，家中也奉祀神佛，同時又是徹底的天皇崇拜者，每天早起必正座禮拜天皇「御真影」。)

(c) 小川娶同鄉松山市銀行員之女為妻，妻比小川小八、九歲，結婚時才十八、九歲。(依酒井，小川結婚於明治三十三(1900)年，妻キク夫人明治十五(1882)年生，今松山市湊町舊藩士吉野長女，基督教徒，較小川小十三歲，1964年去世。)

(d) 小川育有三男六女，太郎第四胎，次郎第六胎，三郎第七胎。起先住在台灣總督府後面的千歲町奏任教任官舍，後來自己買房子，搬大正町(?)，最後搬到台北昭和町(今青田街)台北高校附近。

小川一生的研究跨越漢語、閩南語、南島語三個領域，並且在三個領域的學術性研究都是開拓性的。雖然如此，除了台灣的日本統治階層之外，小川尚義的學術成就，無論在日本國內，或中國、世界都沒有受到重視。雖然在南島語研究領域略具學術知名度，也是戰後的事。至於閩南語研究只有台灣的閩南語學界認識他，漢語研究完全不出名。

他在總督府的工作雖然是台灣語辭典的編纂，但對閩南語研究的貢獻主要是詞彙的蒐集，有關台灣閩南語音韻的描寫、分析及閩南語方言的比較研究，雖然也有一些成果，畢竟沒有什麼突出之處。他在漢語方面的研究，最突出的應該是發表在《日台大辭典》緒言的有關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可是這篇研究從來沒有受到學界的注意，當然也沒有任何學術影響力。而實際上他卻是第一位以現代語言

(e)小川家教甚嚴，但對子女興趣多順其發展，三個孩子都非常有成就，以下是三個孩子的小檔案：

小川太郎(1907~1974)，年輕時即有社會主義思想，當時小川家請人洗衣服，太郎認為只給人家一點小小的錢洗那麼多衣服，不人道，自己洗衣服。台北第一中學畢業後，回松山念松山高校，再入東京帝國大學教育，太郎專研「同和教育」，反對歧視「賤民」。曾任教名古屋大學、神戶大學。(依酒井，太郎參加左翼運動，提倡反天皇制，小川知道了，小川曾欲切腹自殺，後太郎被追緝，逃往台灣避難，小川怒罵太郎反叛。)

小川次郎1912年生，台北高校(依酒井，與劉闊才氏同學)畢業後，入京都大學醫學部，1936年畢業，1943年起任名古屋市立大學醫學部教授，是研究新生兒，特別是未熟兒的專家，1976年退休(63歲)，轉入濱松聖隷看護大學附設病院。今退休住靜岡縣濱松。

小川三郎1916年生，台北第一中學畢業後回故鄉唸松山高校，再入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在四國高松市開業。今住高松。

(f)小川在台灣的薪水因殖民地加給60%，收入尚稱豐裕，但因食指浩繁，並且孩子都在唸書，因此也相當清寒，小川每天早飯吃一個蛋，他吃蛋黃，輪流把蛋白分給孩子吃。孩子最高興的是每一、二年一次，爸爸會帶他們全家到台北江山樓吃飯。

(g)小川身高約一七〇公分，身材瘦長，因長年彎腰伏案，腰背痠痛，常常伏著叫小孩爬到他的背上踩，以為按摩。

(h)小川除了本身的語言學研究之外，也是日本寶生流(hojoriu)能樂的專家，會打小鼓、大鼓。曾有東京的能樂家慕他的名，專程到松山去向小川請教。(依酒井，小川唸東京一高時的1892末，正式師事下掛寶生流師傅寶生新朔習能樂，能奏極困難的樂章。在台灣，也曾教過總督府的上司，每年開謠鼓會數次。歸老故鄉仍繼續玩能樂，號稱下掛寶生流七達人、七不思議。)

(i)小川在戰爭結束前回故鄉松山市，1947年去世前將普通藏書捐贈愛媛縣立圖書館。學術性的書籍，因其弟子淺井惠倫任教南山大學的緣故，捐給南山大學圖書館。(依酒井，小川退休養老的地方是松山市出淵町，依松山市役所的資料，當現在的松山市南堀端町二番三號。所藏筆記、卡片移藏東京外語大學アヅ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或謂部分被美軍帶往美國，藏於耶魯大學。)

(j)依小川次郎的紀錄，小川尚義的忌日是10月21日。(依酒井，小川沒於11月21日。葬松山市御幸町千秋寺小川家墓園。)

學的方法，進行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語言學家。

2. 高本漢小傳

高本漢(Karlgren, Klas Bernhard Johannes)1889年10月5日出生於瑞典。1909年Upsala大學畢業，後來在中國進行數年的漢語方言調查，曾在山西住了較長的時間。1912年又到巴黎去研究，1915年5月獲Upsala大學博士學位。他的指導教授是Upsala大學斯拉夫語教授、也是瑞典方言學之父——J. A. Lundell，他的論文採用的就是Lundell教授所創的音標系統。

1915年至1918年留在母校任副教授，1918年起任Göteborg大學遠東語言文化教授，1931年起昇任該校校長，瑞典皇家學院、瑞典歷史文學院、丹麥皇家學院會員，中國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員，大不列顛愛爾蘭皇家亞細亞學會、巴黎亞細亞學會、河內法蘭西遠東博古學院名譽會員。(5)

高本漢的著作很多，最有名的是他的博士論文“*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1915~1926)，1930年在北京影印再版，漢文題目《中華語音學研究》。此書一出，對漢語音韻學界發生很大的震撼，1940年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參照高本漢後來的修正，譯為中文，題為《中國音韻學研究》，對漢語音韻學、方言學更造成極大的影響，在漢語語言學史上獲得極高的評價。此外，重要的著作還有——

- 1922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漢語中古音的擬測〉*T'oung Pao* 2(21): 1~42.
-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中日漢字音分析字典》Paris.
- 1923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中國語與中國文》London.
- 192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語文學與古中國》Oslo.
- 1928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漢語上古音當中的幾個問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769~813.
- 1928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漢語羅馬字拼音論》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24pp.

(5) 有關高本漢的履歷及著作主要參考《中國音韻學研究》(1938)、羅常培(1933)、張世祿(1937)、西田龍雄(1958.2)。

- 1931 "Tibetan and Chinese,"〈藏語與漢語〉*T'oung Pao* 28.
- 1932 *Shi King researches*.《詩經研究》*BMFEA*4.
- 1933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詞族》*BMFEA*5.
-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中日漢字形聲論》*BMFEA*12.
- 1949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中國的語言》New York : The Ronald Press.
-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中古及上古漢語語音學簡論》Stockholm.

高本漢的精力非常充沛，他不只是漢語語言學家，而且也是漢藏比較語言學家、中國古器物學家、小說家，這裡所列的只是漢語語言學的著作。從這個書目可以看得出來，幾乎每過一兩年就會發表一部或一篇影響深遠的重要論著，並且有很多著作部頭相當大，像他的《中華語音學研究》原文就有 898 頁之多，譯本《中國音韻學研究》有 731 頁之多。中國人要讀得通中國聲韻學已經不簡單，一個外國人不但讀通了，並且廣泛地做了中國各地的方言或日本語、朝鮮語、安南語漢字音的調查、比較，並做了古音擬測，而這些艱苦的拓荒工作竟在他大學畢業之後的六年內完成。接著他又作了上古音擬測，語源學、文獻學的研究，涉獵極廣而深，對於漢語語言學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與卓著的貢獻。

他是西方人之中，第一個以現代語言學的科學方法，進行廣泛的漢語方言調查、比較和古音擬測的人。無論在歐美、中國、日本的漢學界，高本漢無疑是影響力最大的人，在中國或日本，他的著作翻譯版也最多，在漢語語言學史上，他堪稱光芒萬丈、無與倫比。

小川尚義和高本漢都是接受現代語言學訓練過的語言學家，也從事過漢語歷史比較語音學的研究，不過在漢語學界小川尚義默默無聞，並且除了南島語之外，他沒有什麼學生，當然也沒有什麼學術影響力，和高本漢光芒萬丈的學術知名度、學術影響力，簡直無法相提並論。兩人的命運真有天壤之別。

(二)比較之著作

小川尚義：《日台大辭典》(1907)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南部福建語ノ特徵〉

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1915~1926)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本(1940)

小川尚義和高本漢的語言學的研究領域非常不同，不過兩人都曾運用了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過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本文所要比較的這兩篇論文，就是兩人研究領域交叉的部分。

小川尚義的論文附錄在《日台大辭典》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南部福建語ノ特徵〉。《日台大辭典》1907年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編輯發行，其中緒言部分佔了212頁。依小川尚義在卷末〈本書編纂ノ顛末〉所述，這篇緒言及卷首所附的〈台灣言語分佈圖〉為小川尚義所著作。這篇緒言是東方人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所寫的第一篇漢語語言學論文，而這張方言分佈圖也是漢語的第一張語言地圖。

高本漢的論文原文以“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為題，發表在J. A. Lundell發刊的*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第十五種。第一、第二卷是做為Upsala大學的博士論文(1915年5月通過)發表的，原分四冊出版，第一冊：第一卷及第二卷除複合元音，1915；第二冊：複合元音至第三卷日母完，1916；第三冊：第三卷泥娘來至卷末，1919；第四冊：第四卷方言字彙，1926。全部發表完畢共歷11年。1926年在Göteborg出版合訂本，內文共898頁，1930年在北京影印，題為《中華語音學研究》。1940年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之，題為《中國音韻學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共731頁。

由提出博士論文的1915年到譯文發表的1940年共歷25年，高本漢的論點曾經做了若干修正，譬如Maspero發表了“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sous les T'ang”〈唐代長安方言〉(1920)，提出了一些和高本漢不同的意見，高本漢認為Maspero的觀點不錯，1922年發表“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中國古音的擬測〉等作自我修正，中譯本即根據後來的修正論點翻譯。另外原文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誤，翻譯時都加以改正，又加入了一些新材料，部分加以重編，音標符號改用國際音標。總之翻譯本其實不只是高本漢的個人的業績，也有一部分是譯者的努力。本文的比較主要根據翻譯本，必要時參考原文。

以下所謂「小川文」指《日台大辭典》緒言第三章第二項第一款〈南部福建語ノ特徵〉；所謂「高文」指《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本；所謂「兩文」指上述「小川文」和「高文」的合稱。本文中引用前人論文時，不重複交待書名的全名。

高文發表的時間以第一卷的1915年計比小川文的1907年晚了8年，以全部發表完畢的1926年計比小川文晚了11年。

三、論文內容之比較

(一)關於研究之目的

小川尚義：爲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而作現代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爲了理解今音的分歧，作了中古音擬測。

高本漢：爲擬測中古漢字音而作現代漢字音的調查、比較研究。

小川尚義在緒言中說：

「研究南部福建語在音韻上的特徵，勢須比較中國各種語音……。」

(頁6)

所謂中國各種語音，包括現代漢語方言漢字音及域外漢字音。

小川尚義這篇現代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研究，只是整個緒論的一部分，即第一款：〈南部福建語的特徵〉，比較現代漢語方言，以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緊接著是第二款：〈讀書音與俗音〉，比較閩南語的文白異讀；第三款：〈南部福建語的方言〉，比較閩南語內部方言差，指出漳泉方言及其次方言的特色。由此可見，現代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的比較只是上述三個層次的方言比較的一部分。

對小川尚義來說，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研究或中古音擬測，不過是閩南語研究的基礎，閩南語研究才是他的目的，閩南語以外的漢字音比較是閩南語研究的手段。小川尚義並未解釋爲什麼要作中古擬測，但從全文看來，顯然目的只是讓讀者了解現代漢字音的分歧原委而已，擬音不是小川文的目的。

相反的，對高本漢來說，古音擬測是他研究的主要目的，高著〈譯者提綱〉說：

「高氏工作的計畫是用現代方言的材料來擬測古音……」(頁17)

高文在〈緒論〉中一開始便批評當時的古漢語擬音缺乏「語言學」的基礎，所以他認爲：

「中國語言學現在還不過剛在起頭的時候，這是得要承認的。在我一方面，我願意對於這個新科學的建樹有所貢獻，我就想開始：

1. 把中國古音擬測出來，要想作系統的現代方言研究的起點，這一層是很必要的；
2. 把中國方言的語音作一個完全描寫的說明，作過這層之後然後可以；
3. 用音韻學的研究指明現代方言是怎樣從古音演變過來的。

要得到可靠的結果，我以為得要把我的研究放在一個很寬廣的基礎上。每一條語音定律只有少數的幾個例是不行的，因為少數的例不能作充分的保障。所以我拿來作基本材料的就有三千一百上下語言中常用的字(不過有些很常用的字倒是沒收，因為未能確定他們在古音中的地位)。這麼多材料我覺得已經够把我要找的結論確定到相當的重要地位了。」(頁13)

高本漢是現代漢語方言學的開拓者，他在本文中所做的工作對現代漢語描寫語言學的貢獻是很大的，不過從上文和整篇高文看來，現代漢語研究的主要目的顯然是重建中古漢字音的音韻系統。否則為什麼高文的研究要側重單字音？為什麼「未能確定他們在古音中的地位」的常用字不加調查？如果高文的目的是為他「要找的結論(即古音擬測)確定到相當的重要地位」，他的做法是合乎目的的，如果他的目的是在描寫現代漢語方言，顯然這樣的做法值得批評。此外值得批評的還有下文將要討論的「重文輕白」、「轉寫錯誤百出」、「不標示聲調」、「不標示喉塞音」等。這些缺點因為並不嚴重影響高本漢的結論，依照他的古音擬測的目的，那樣大量的、全面的現代漢字音材料，確實可以讓高本漢相信已經「夠把要找的結論確定到相當的重要地位」了。

所以雖然我們承認高本漢對現代漢語方言研究的貢獻，不過就高文的研究目的而言，我們相信現代漢字音的研究是古漢字音研究的手段，漢字音比較是古音擬測的手段，最終目的在中古漢字音的擬測。

小川文和高文研究目的的根本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和論述方式的差異，這對理解兩文內容的不同有基本的重要性。

(二)關於研究之方法

小川尚義：以中古音類為綱，舉例羅列閩南語以下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方音對照表與古今音對應表，為便於理解現代音之的分歧，做了中古音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的擬測。

高本漢：以中古音類為綱，舉例羅列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方音對照表與聲母古今音對應表，做為中古音擬測的基本證據。

小川尚義在緒言中說：

「研究南部福建語在音韻上的特徵，勢須比較中國各種語音，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日台大辭典》，頁6)

也就是採用《韻鏡》的音韻系統為綱，然後分「聲母」、「韻尾」、「韻母」、「聲調」四部分，依韻鏡之音類，舉例羅列閩南語以下各種漢語方言、域外漢字音，製成漢字音對照表，最後總結製成古今音對應表。為呈顯現代音之特徵，於中古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做了擬測。

至於高本漢的擬音步驟是：⁽⁶⁾

1. 從文獻中考出古音音類系統。
2. 對現代漢語方言或域外音作一個全面的描寫。
3. 擬測古音音值，合理地解釋如何由古音演變到今音。

以上三點缺一不可，缺一點就不能稱為「專家所做的科學」的擬音。高著〈譯者提綱〉說：

「高氏工作的計畫是用現代方言的材料來擬測古音，但是研究現代的方言，必得要有個基本的出發點。他所用的基本出發點就是在第一卷第一至第三章所整理出來的古音類系統。」(頁17)

雖然兩文的目的不同，但是在以中古音為基礎做漢字音比較，全面地比較各大方言或域外漢字音，並製作漢字方音對照表與古今漢字音對應表，兩者所採用的方法是一樣的。這個方法，在小川尚義以前的學者已經用過了，但是都做得非常簡略而缺乏學術性。譬如 Parker 在 Giles 的大字典裡雖然附錄了許多方音，但是沒有和中古音比較，看不出方音之間的系統性的意義，材料雖多也不過是一堆雜亂的素材罷了；Volpicelli(1896)的論文只有簡單的古今音比較表，也沒有漢字方音的系統比較，不能給他的古音擬測提供較完全的論據。

小川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漢字音方言比較的語言學家。雖然古音擬測並非小川文的主要目的，可是由於小川尚義是第一個做漢字音廣泛比較的人，他的擬測也不是興之所至的猜度，他也是第一位做科學擬音的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他擬音的結果比較高本漢更合理(見本文〈八、關於古音擬測〉)。

不過就研究方法的嚴謹性而言，小川尚義顯然不及高本漢，小川沒有一套精密的標音符號系統，也沒有親自做過廣泛的漢語方言調查，小川用的是精密性不夠的羅馬字，他的方言資料除了閩南語之外全部採用他人的資料。而高本漢寫論文的時候(1915)，西方的描寫語言學已有相當成績，他採用的是他的老師 Lun-

(6) 有關何謂「專家所做的科學」的擬音(語見〈緒論〉p.3)，高本漢其實沒有在論文中做詳細的闡述，以下三點是根據高本漢在〈緒論〉中所做的簡單論述所整理出來的(參見本文〈一、關於研究之目的〉所引)。

dell 教授的一套精密的標音系統，親自做了相當廣泛的漢語方言調查。除了基本的語言學訓練之外，高本漢特別指出他研究漢語的方法是用瑞典的方音研究的方法。高本漢曾說：

「差不多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方音研究能像瑞典這樣進深的。在前一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就曾經有一番很有效果的工作，是用最新的方法來分析瑞典各種語言，並且曾經有美滿的結果。我現在就是提議用我們瑞典的方法來研究直到現在還未經十分墾殖的中國音韻學。」(原序，頁2)

小川尚義的擬音說明非常簡單，而高本漢的擬音說明非常詳細，講究論證的邏輯性。就整體而言，高本漢無論在資料的取得或擬音的論證，都比小川尚義更具學術嚴謹性。不過，這不是說高本漢本身在以上的這兩方面就沒有值得批評之處，如下文(見〈四、關於方言比較的基本資料〉)可知，高本漢值得批評的錯誤也很嚴重。也就是說雖然高本漢在研究方法上比較小川尚義進步而專業，但實際的運作也有不嚴謹疏忽之處。

小川寫本文(1907)的時代，描寫語言學尚不發達，當時世界上還沒有一套精密而通行的標音工具(如IPA者)，小川文不夠精密是歷史的限制，不是小川尚義本人的責任。1935年小川尚義發表《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即採用精密的國際音標，並做了廣泛的台灣南島語調查比較研究，證明了小川尚義是具有和高本漢相當的描寫語言學的能力。

(三)關於中古音文獻

小川尚義：《韻鏡》。

高本漢：《康熙字典》為主，兼用《切韻指掌圖》。

小川尚義在緒論中說：

「……今此等比較之基礎，以《韻鏡》為主，蓋《韻鏡》之音雖未必表示中國語之最古音，但其音韻之種別頗為精密，在比較上最為方便……。」

(《日台大辭典》，頁6)

《韻鏡》是當時久已失傳於中國而保存在日本的一本中國的古韻圖，有永祿本、寬永本等，清末始回流中國。《韻鏡》是目前所見最古韻書，最能表現《切韻》音系。王力對本書有所評價。王力先把韻圖分為三種，說：

「韻圖有三派：第一派是把字音分為二呼，每呼四等，按《切韻》的韻部分為四十三圖，《韻鏡》和《七音略》屬於這一派；第二派也是把字音分為二呼，每呼四等，但是把切韻的韻部合併為二十圖或二十四圖，《四聲等

子》、《切韻指掌圖》和《切韻指南》屬於這一派；第三派是把字音分為四呼而不分等，梅膺祚《字匯》後面所附的《韻法直圖》和《韻法橫圖》、《康熙字典》前面所附的《字母切韻要法》、潘耒的《類音》屬這一派。」

(王力 1963 : 417)

王力緊接著批評道：

「如果我們要了解孫炎、徐邈、李軌、沈重、曹憲等人的反切而希望查韻書來解決的話，只有查《韻鏡》、《七音略》才是靠得住的；第二派已經泯滅了二百零六韻的界線，古音已不可追尋；第三派更不必說了。」

(王力 1963 : 418)

由此看來，小川直接採用《韻鏡》作為今音比較的古音基礎並沒有什麼瑕疵可言。若問小川尚義何以知道採用《韻鏡》？這是因為《韻鏡》一書在日本傳統語言學的地位有如聖經一般。日本的「字音假名遣い」(漢字音注音)，無論吳音、漢音、唐音都根據《韻鏡》加以系統化。所以小川尚義採用《韻鏡》作為古音基礎是很自然的事。(7)

小川文中在漢字音對照表中逐字記上反切，但是小川尚義並未說明那些反切引自何書。

至於高本漢則主要參考《康熙字典》，其他真正的古文獻，高本漢所看到的多半是二手資料。高著〈譯者提綱〉說：

「這幾章裏所引用的書本上的材料可惜還不是最完全精確可能的材料。因為著書的時候著者沒有見到切韻的各種殘卷，沒有見到過集韻、韻鏡、切韻指南的本書，而所引廣韻反切往往是康熙字典裏所引錯的反切，結果在好些地方都不免有細節上的錯誤(譯文裏都改正過了)。」

(頁 17)

高本漢的中古音材料主要是康熙字典所引《廣韻》的反切及其卷首的《等韻切音指南》、《切韻指掌圖》，高本漢在書中雖然提到《切韻》殘卷、《韻鏡》等古音文獻資料，實際上高本漢並沒有找到原本好好運用，對於它們和後出的一些韻書或韻圖當然也沒有好好比較，以致發生了一些誤會，譯者在譯文的註脚中都一一加以駁正或改正(最可笑的錯誤如高著原文誤把 Maspero 所介紹的 Yun-king 譯為「韻

(7) 黑川真賴(1829~1906)教授在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科所開的「字音假名遣」即以《韻鏡》為教本。小川尚義應當上過黑川先生的課。參見保科孝一(1952)、長志珠繪(1993.10)。

經」(頁34)，譯本改爲「韻鏡」(頁22)。高本漢以前的漢語音韻學家如 Volpicelli、Schaank 等全部都只以康熙字典的《字母切音指南》爲唯一的中古音韻文獻，高本漢在文獻蒐集方面好像進步不太多。

中古音系對小川文來說只是一個參考系統，所以不一定要最古的文獻，但是對高文來說，文獻的時代定位直接影響到擬音的時代定位，歷史語音學的研究必須非常講究文獻學，高本漢對最古的古音文獻沒有積極的找來原版、加以研究，不能不說是高文的一項缺憾。小川文採用了最古的《韻鏡》作爲上古音參考系統似乎比高文高明。(8)

因爲高本漢沒有得到最古的古音文獻，所以他必須參照韻圖和反切作一番繁複的考證，所幸經過考證的中古音系還不算離譜。〈譯者提綱〉說：

「……但是大體上他所描寫的古音系統是可以成立的，他所列的三千多字的聲母韻母表，十分之九五以上是可以用來做方言調查用的。」

(頁17)

(四)關於方言比較的基本資料

小川尚義：除閩南語外主要採用別人的資料。

高本漢：親自調查了24點，但偏重北方，南方資料採用他人資料，但轉寫爲標法一致的寬式音標。

小川尚義在緒論說：

「中國各種語言之中，上海、南京、汕頭之音取之於 Williams 氏辭書，福州、客人、廣州、温州、寧波、朝鮮、安南諸音取之於 Giles 氏辭書，但廈門音依編者之綴字法。」(頁9)

小川是閩南語專家，台灣總督府所有的辭典都是在他的主持下編纂的，辭典中正確地註明廈門、漳州、泉州及漳泉各地方言，證明他對閩南語方言非常熟悉，他所做的調查可能只限於台灣，不過當時台灣的閩南語變化不大，尤其是北部，漳泉區劃更清楚，所以調查台灣或閩南方言對於了解漳泉音的意義差不多。

(8) 小川尚義對於中古音系的了解可能不及高本漢，雖然高本漢所整理的音系也有問題，基本上問題不大。但小川尚義在古今音比較表之前有一張〈韻鏡三十六字母定位表〉，詳列各聲紐在各等的分佈，其中發生了許多錯誤。譬如群紐只有三等、匣紐無三等、喻紐只有三四等……，但表中這三紐四等都有；又精系也有三等字，可是表中三等却不見精系。可見小川尚義對於中古音系統不太熟悉，小川的比較研究尚嫌粗略。

小川尚義沒有調查到的其他漢語方言當然必須依靠他人的二手資料，而當時最普遍被引用的資料就是 S. W. Williams(衛三畏廉士甫)的《漢英韻府》(1874)和 Herbert A. Giles 的《華英大辭典》(1892)，前者記錄了南京、上海、廣州、廈門四個方音，另附錄〈聖諭廣訓〉記錄了北京、南京、漢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汕頭、廣州九種讀音；後者由 Parker 附錄了廣州、客家、福州、溫州、寧波、北京、華中、四川、揚州、高麗、日本、安南等十二種方音。這兩部辭書為後來的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對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貢獻良多，Volpicelli(1896)、Schaank(1897~98)和小川尚義(1907)都毫無批判地引用為比較材料，在當時這兩本書就是漢語方言的權威資料。

可是高本漢主要的材料是根據自己的語言調查，不得已時才採用他人的資料。〈譯者提綱〉說：

「……他所蒐集的方言，除零星記錄偶爾引作例證不計外，正式用三千多字的例字表來記音的有三十三種，其中親自調查的有二十四種，從書本上得到材料的有十種(其中一部分後來又加以實證或修改)。」

(〈譯者提綱〉，頁18)

高本漢根據自己的調查資料，對上述小川所引用的兩部大辭典提出質疑說：

「拼音拼的不對以致我們不能用的，那是多得很。S. W. Williams 在他的 Syllabic dictionary 的索引裏把字典裏的字加上上海的讀音，可是這些上海的讀音是很可疑的。……但是直到現在，在所有發刊過的中國語言的說明當中，最『像煞有介事』而結果最錯的，就是 Parker 在 Giles 的大字典裏頭每個字所注的十二種方音……。二十年來，這個字典大家既然認為中國方言知識的主要材料，那麼現在就應該給它稍微詳細審查一下，好讓這個東西的價值縮小到它的真尺寸。」(頁9)

高本漢對 Parker 的批評有幾個理由：

- (1)資料抄錯的地方很多。
- (2)體例混亂，不知所指。
- (3)標音方法不一致，頗多同音異符或異音同符，甚至同一系統的方言都不能遵守一致的標法。

高本漢採用的是瑞典 Lundell 教授所創的瑞典方言字母，以瑞典方言調查的經驗調查了漢語方言，他親自調查了二十四種漢字音，並用嚴式音標記錄下來。不過高本漢所記錄的偏重於北方方言，特別是山西方言，關於更複雜的南方方言，他的調查嚴重不足。他既然認為要找到古音的門徑必須探索所有的方言，所

以有關南方方言，便不得不採用他人的二手資料。Parker的資料既然不可靠，他必須依靠一些傳教士業餘從事所發表的方言字典，至於那些方言字典，可以說是Parker的第一手資料哩。這樣擴充資料的結果，使得高文的方言比較點達到三十三點之多，日本分吳音、漢音，所以實際是三十四種。

可是這些字典都是用普通的羅馬字所寫，準確的音值無法確定，高本漢必須根據字典作者所作的「太幼稚的定義」，把那些拼法不一致的羅馬字轉寫為拼法一致的寬式音標。於是在高本漢的論文裡有兩套音標，對於他自己調查的二十四點方言，採用的是嚴式音標，這類方言，高本漢特別稱之為「審核過的方言」。至於引用他人的資料，採用的是寬式音標，音標所代表的準確音值無法確定，那應該說是「未經審核的方言」了。

比較小川尚義和高本漢的方言資料，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 (1) 高本漢主要採用自己親身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小川尚義主要採用別人所調查的資料。
- (2) 高本漢雖然於南方方言資料採用別人的二手資料，但是轉寫為統一的寬式音標，是經過消化的過程的。小川尚義採用別人的資料是直接的引用，沒有經過消化的過程。

由此看來，關於比較方言的基本資料的取得與運用，高本漢的確比小川尚義嚴謹得多。

不過實際上高本漢的記音也有令人不敢苟同之處，以下舉兩個主要的缺點來批評。

1. 入聲喉塞音的省略

關於入聲喉塞音，高本漢說：

「ʔ……在漢語裏卻佔一個重要地位。……ʔ在韻尾的地位見於山西、懷慶、南京、上海、閩語……例如‘八’南京 pɔʔ」(頁196)

高本漢在書中明白反對把-ʔ韻尾當作「元音的突止」或「元音的促頓」而省略，可是在〈方言字彙〉的對照表中，所有的-ʔ韻尾都被高本漢省略了，表中各個記音都不記調類或調值，單從記音根本無法判斷是否有-ʔ韻尾，雖然高本漢在入聲表的表首中，說明山西、南京、上海、懷慶、閩粵方言的入聲都有-ʔ韻尾(頁689)而被他省略，可是這個說明很小，很不顯眼，表首也沒有例言，如果沒有注意到這個說明，我們還以為所有漢語方言都沒有-ʔ韻尾哩。雖然把-ʔ韻尾的存在作了交待，不能不說是一項缺點。至於小川尚義的對照表卻都好好地記著-h表示

喉塞音韻尾的存在。

2. 引用材料的轉寫錯誤

高本漢對南方方言嚴重地缺乏資料，因此不得不抄襲一些譯文所謂「愛美的」(amateur 門外漢)的資料，但是高本漢抄襲的時候也難免不求甚解的地方。譬如高本漢說：

「汕頭話跟廈門話古爆發音跟摩擦音並不顎化，只有塞擦音才顎化。它們有個特點，就是顎化作用不僅在高元音*i*的前頭出現，就是在*ɛ*的前頭也出現。在*i*、*ɛ*以外所有別的元音的前頭舌尖的發音部位都保存著，不過在廈門話所有的送氣的塞擦音都是顎音，這是一個重要的例外。」(頁391)

這是一段可笑的描寫。高本漢自稱沒有調查過廈門話(見高文頁145及本文〈五、關於方音比較點與調查點〉)，他怎麼能夠把廈門話的音值描寫得這麼詳細呢？我們做過很多閩南語方言的調查，也看過許多學者的報告，都沒有發現過或聽說過廈門或其他的閩南語方言有高本漢所發現的這種「重要的例外」。

高本漢到底是怎麼發現的呢？我們查出高本漢有關廈門方言的資料來源是杜嘉德(C. Douglas 1873)的《廈英大辭典》(見高文〈緒論〉，頁8)，這個辭典很奇怪地把〈爭〉字頭 / *ts* / 分為 *ch-*和 *ts-*，前者接前元音(-*i*, *e*)，後者接後元音(*u*, *o*, *a*)及韻化鼻音(*ng*)；但〈出〉字頭 / *tsh* / 則只用 *chh-*，〈時〉字頭 / *s* / 也只用 *s-*。這樣奇怪的標音是沒有什麼根據的，不合實際音值，也不合聲韻學原理，在當時就曾發生過爭論的。同時在廈門、漳州做調查的 Schlegel 曾在他的大著《荷華文語類參》(1882)中提到他和杜嘉德協調 *ch* / *ts* 不必分別之類音韻學的或標音法的問題，但不為杜嘉德所接受(見《荷華文語類參》卷三，頁23~25)。杜嘉德的標音方式為 Barklay、Campbell 所繼承，成為教會的正書法，直到戰後教會才統一標為 *ch*，廢掉 *ts* 音符。

羅常培《廈門音系》(1931)也注意到教會羅馬字的這個問題，他說：

「……但是跟 *ts*、*ch* 相對的送氣音……等字卻一律標作“*chh*”，究竟舌尖破裂摩擦音因顎化而變成舌面破裂摩擦音的現象只限於不送氣音呢？還是他們辨音的疏略呢？」(緒論，頁3)

「……據我記錄林先生發音，認為這四個音劃然不混，並且在 [*a*] [*ɔ*] [*o*] [*e*] [*u*] [*ŋ*] 等音前面的一律讀成 [*ts*] [*ts'*]，祇有在 *i* 音前面的才因顎化(*palatalize*)的影響變成 [*tɕ*] [*tɕ'*] 音。」(頁7)

否定了高本漢所發現的「重要例外」。可見高本漢是被杜嘉德錯誤的標音誤導了。

高本漢被杜嘉德的標音誤導因而轉寫錯誤的例子非常多，比較羅常培(1931)、杜嘉德(1873)及高本漢記的廈門音(後附為引自高文頁碼)，就知道高本漢如何地不了解杜嘉德的音標所標記的廈門音音值：

	羅常培	杜嘉德	高本漢	
家	ke	ke	kɛ	(頁 494)
瓜	kue	kue	kuɛ	(頁 495)
雞	kue	ke/koe	kɛ	(頁 487)
底	tue	ti/te/toe	ti/tɛ/toi	(頁 391)
程	thiəŋ	theng	t'ɛŋ/t'ieā	(頁 287)
增	tɕiəŋ	cheng	cɛŋ	(頁 391)
勝	ɕiəŋ	seng	sɛŋ	(頁 509)
釵	ts'ai	chhai/thoe	c'ai/t'uɛ	(頁 295)
鉤	kɔ	kɕ	ko	(頁 514)
烏	ɔ	ɕ	o	(頁 517)
補	pɔ	pɕ	po	(頁 424)
褒+	po	pɕ	po	(頁 424)

高本漢明顯而不可原諒的錯誤至少有如下的幾點：

(1)他把杜辭典的 e 元音統統轉寫為 ɛ。其實杜辭典 e 表 [e]，ɛ 表 [ɛ] (見杜辭典 Introduction p.x)，是兩個不同音位；又把杜辭典的 eng 轉寫為 ɛŋ 有時作 Eŋ，也不能維持統一的轉寫系統，其實杜辭典的 eng 相當於 Doty(1853)所標的 ieng (見杜辭典 Appendix p.607)。廈門音和泉州系方言一樣有明顯的介音 -i-，杜辭典標為 eng 乃是沿襲麥都思 Medhurst(1837)字典的傳統(麥都思所描寫的漳州音正唸作 [ɛŋ])，杜辭典一方面非常注重音值，一方面又企圖以同一標法涵蓋不同方言的異讀，ieng 和 eng 只是方言異讀，用同一標音未必表示同音值。廈門音的實際音值是 [-iəŋ]。羅常培說：

「ieng, iek 兩韻，Douglas 等都作 eng, ek；只有 Doty 寫作 ieng, iek。照這兩韻的音值 [iəŋ] [iək] 看來，[ə] 本來是從前元音到輔音中間的一種流音，那麼，與其寫作 eng, ek，不如寫作 ieng, iek 較好。」(頁 33)

(2) 他把杜辭典的 θ 都轉寫爲 o ，而不知道杜辭典的 θ 表 [υ]， o 表 [o] (見杜辭典 Introduction p.x)，廈門話 υ 和 o 是兩個不同的音位，高本漢居然混同爲 o 了。

(3) 杜辭典的 oe 表的是 [ue] 音，高本漢有時轉寫爲 $u\epsilon$ ，有時竟寫作 oi 。廈門話根本沒有 oi 韻母。

高本漢一個人同時要處理三十幾種不同的方言，抄錯、或轉寫錯誤在所難免，即使有上述的錯誤，就整本書而言，也可以說瑕不隱瑜。不過從上面的例證看來，高本漢轉寫的時候，不但沒有簡單地調查一下廈門音，恐怕連杜辭典的標音系統都沒有好好研究，甚至連 Introduction 或 Appendix 都沒有細讀便加以引用。

高本漢在批評別人時總是毫不留情的。他把十九世紀末期及二十世紀初期人們所公認的「漢語方言的頭等專家」Parker 的著作批判到一文不值，可是 Parker 所犯的錯誤，高本漢都照犯不誤。因此，至少對於高本漢書中所錄而高氏本人未曾調查過的方言資料，即不屬高氏所謂「審核過的方言」，我們不能不採取極度謹慎、懷疑的態度。

高本漢對於近代新教傳教士等一些他所謂「愛美的」(Amateur) 所編的漢語方言辭典採取頗爲輕視的態度，這個態度影響了中國語言學家，致使這些方言辭典得不到應有的重視，而後來的語言學家其實也沒有編出幾本更好的方言辭典，即使編出來了，因爲時代懸隔，語言已發生變化，舊辭典仍有參考價值。舊辭典即使編輯水準不高，只要是實際語言的紀錄，文獻價值是很高的，我們如因輕視而加以忽視，將是莫大的損失。

(五)關於方言比較點與調查點

小川尙義：調查 3 種、比較 17 種，調查點限於閩南語、比較點平均分佈各大方言。

高本漢：調查 24 種、比較 34 種，均偏重北方方言。

小川尙義主要比較了廈門、福州、客人、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日本，共 12 點，其中日本分漢音、吳音，所以實際上是 13 種，另外必要時也比較漳州、泉州、汕頭、梵音，共得 17 種。其中除閩南語之外都採用他人的資料。

高本漢親自調查了 24 點，比較了 33 點，其中日本分吳音、漢音，所以實際上比較了 34 種的漢字音。

現在將小川尚義和高本漢所調查、比較的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列表比較如下(“x”表未調查、未比較，“*”表既有調查又有比較的方言，只列地名者表未經親自調查的比較點)：

小川尚義	高本漢
A 北方方言	
北京	北京 *
x	山西
x	歸化城 *
x	大同 *
x	太原 *
x	文水 *
x	太谷 *
x	興縣 *
x	平陽 *
x	鳳台 *
x	甘肅
x	蘭州 *
x	平涼 *
x	涇州 *
x	陝西
x	西安 *
x	三水 *
x	桑家鎮 *
x	河南
x	開封 *
x	懷慶 *
x	固始 *
x	四川南部
x	漢口
南京	南京 *
x	揚州

B 南方方言

吳語

上海

溫州

寧波

閩語

福州

廈門 *

漳州 *

泉州 *

汕頭

粵語

廣州

客人

吳語

上海 *

溫州

寧波

閩語

福州 *

廈門

x

x

汕頭

粵語

廣州 *

客家

C 域外譯音

朝鮮

日本

吳音

漢音

安南

梵文

朝鮮

日本 *

吳音

漢音

安南 *

x

現在將兩文的比較點、調查點，分爲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域外漢字音分別統計如下：

	小川尚義		高本漢	
	比較	調查	比較	調查
北方方言	2	0	21	19
南方方言	10	3	8	5
域外譯音	5	0	4	2
合計	17	3	34	24
比率	100%	17.6%	100%	70.6%

由上面的統計數字看出以下的幾點：

1. 北方方言的使用人口雖然佔了中國人口的 70%，但南方方言遠比北方方言複雜而存古，對重建中古音而言，高本漢的比較資料北方方言比南方方言多了將近三倍，調查點多了將近四倍，顯然過度偏重北方。

小川尚義於北方方言只取北京、南京兩點，南方方言所選的比較點和高本漢幾乎一致，整體看來，每一個大方言所選的比較點和該大方言的複雜性大體上均衡。翟理斯的大辭典裡北方方言的資料還有華中、四川、揚州等，小川尚義大可儘量引用，但小川尚義寧可放棄，看得出他選擇比較點的用心。小川尚義從他的研究目的而言，多選擇閩語方言點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小川文在比較漢語方言的第一款中，閩語方言只選了福州、廈門，必要時——譬如和廈門有嚴重分歧時——才增加漳州、泉州、汕頭三個比較點，梵文只在考證聲母音值時才引為證據。廈門、漳州、泉州次方言的比較設第三款〈南部福建語的方言〉專門處理，看出小川對論文結構謹慎處理的態度。

高本漢於南方方言比較點的選擇和小川尚義頗近似，看得出他用心考慮比較點的均衡分佈，但是北方方言內部有極大的同質性，高本漢對自己親身調查的過剩的北方方言資料，似乎可以另外輯為一冊出版，但他沒有這樣做。在第四卷〈方言字彙〉中雖然割捨了一部分同質性很高的北方方言資料，大部分還是列入了。他所列入的北方方言資料之間的同質性，較之廈門、漳州、泉州、汕頭之間的同質性還高，如果北方方言資料割捨不了，那麼南方方言資料應該儘量蒐集列入，才能取得平衡。高文的比較點表面上雖然比小川文多了一倍以上，但比較點分佈不均衡，對古音的擬測實質上的價值並沒有因而多了一倍。高本漢對於比較結構處理的用心顯然不如小川尚義。

2. 高本漢和小川尚義的兩個共同點是：(1) 都把客語歸入粵語；(2) 都沒有湘語和贛語資料，兩文和 Möllendorff “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es chinois” (1899) 對於漢語方言的分類一致，Möllendorff 也把客語歸入粵語，並且沒有湘語和贛語。小川文明白指出他對漢語的分類是依據 Möllendorff (小川文，頁 3)；高文雖然沒有說明他的漢語分類何所據，看得出受到 Möllendorff 影響的痕跡，表現了當時對於漢語方言分類的知識水準。

3. 高本漢的調查點佔比較點的 70.6% 弱，相對的小川尚義只有 17.6% 強，顯然高本漢在描寫語言學所下的功夫比小川尚義多得多。

(六) 關於漢字音對照表

小川尚義：選字 749，依《韻鏡》音類分爲 149 表，羅列 13~16 種方音，文白音兼注，例字註反切。

高本漢：選字 1329，合爲一表〈方音字彙〉，羅列 26 種方音。重文輕白，例字註所擬古音。

小川文和高文都製作了漢語方言及域外譯語漢字音對照表，小川的對照表沒有特別的題目，高本漢的對照表譯本叫做〈方音字彙〉，原文叫做 *dictionnaire*。兩個對照表的內容非常相似，但是因爲研究目的的不同，兩種對照表的處理方式不太一樣，以下分方言點、例字、古音註明、意義說明等四個方面來作比較：

1. 方言點

小川尚義的對照表羅列了依序爲廈門、福州、客人、廣州、上海、溫州、寧波、南京、北京、朝鮮、安南、漢音、吳音等 13 種漢字音，漢音及吳音以片假名標音，其他點以羅馬字標音，漢音及吳音和反切附注於例字之下，⁽⁹⁾其他列入表中。表中方言點排列的順序看出是以廈門音爲中心，其他點依其與廈門的距離，由近而遠排列。

廈門音如有文白兩讀則析爲「廈、讀」及「廈、俗」兩欄，或并列一欄而註明文白音。廈門以外的方言文白異讀也儘量在表中并列。閩南語方音如與廈門音相去太遠，則另闢漳州、泉州、汕頭欄，總計共羅列了 16 種方音。

高本漢雖然說是比較了 33 個點 34 種漢字音，但是表中只羅列了依序爲高麗、漢音、吳音、安南、廣州、客家、汕頭、福州、溫州、上海、北京、開封、懷慶、歸化、大同、太原、興縣、太谷、文水、鳳台、蘭州、平涼、西安、三水、四川、南京等 26 種方音，方言點排列的順序似乎是以北方官話爲中心，由遠而近排列，北方官話又是由北京反時鐘方向地繞一圈，而南京似乎是中心了。閩語只列福州、汕頭兩點，沒有廈門音，這大概因爲他所參考的杜辭典 (Douglas 1873) 沒有漢字對照，引用不方便的緣故。

2. 例字

小川的對照表分爲聲母、韻尾、韻母、聲調四節，每節依中古音類或現代方

(9) 小川文中所記的吳音、漢音，與普通社會上所用的、或字典所載的音不一樣，最特殊的是鼻音韻尾分 -n、-m，現代日本語無論吳音、漢音，都只有一套鼻音 -n，未知小川尚義的音何所依據。

言的分化情形分別製表，所以文中的對照表很多，共 149 表，現在將各節的例字字數、表數統計列表如下：

聲母	183 字	42 表
韻尾	61 字	12 表
韻母	446 字	75 表
聲調	59 字	20 表
合計	749 字	149 表

由統計數字算出每一個表的例字平均只有 5 個字。

高本漢只有 1 個依韻母所製的對照表，這個表先把韻母分爲舒聲、入聲兩類，然後再依高氏自己所分的韻攝及順序：果、止、蟹、咸、深、山、臻、梗、宕、效、流、遇、通等十三攝，及平聲、入聲的順序，把所有例字啣接起來製成一個對照表，謂之〈方音字彙〉。

表中所記的音只有讀書音，白話音偶爾附記於表下的說明中，可是掛一漏萬，譬如閩南語的最常用字大部分都有文白異讀，像〈方音字彙〉中的哭、學、東、空都是常用字，都有文白異讀，可是表中都只記文讀音，不記白話音。白話音被排除在表外或被忽視，這種重文輕白的作法，表現高本漢的對照表意不在反映語言的事實，只是提供他擬測古音的證據罷了。而小川的表則文白都儘量標記，表現了小川比較注重語言的事實。

高氏在文中一再告訴我們，他調查或蒐集了 3125 個字音（見頁 237），這些字大體上是常用字，有些常用而不收的原因是「因爲未能確定考出他們在古音中的地位」（見高文，頁 13）。書末所列的〈方音字彙〉只列出 1329 字，其他的字被刪掉了或附錄在表外。高本漢對照表例字的選字原則並非依其常用與否，而是依其是否可以證明由古音到今音具有「照規則的變化」（見頁 539）而決定。如果是不規則的變化，就被排除在表外的附註中。這個做法也符合高文擬測古音的研究目的。

3. 古音註明

小川與高氏兩文的對照表都在每一個例字上註明古音，不過小川的表註的是反切，高氏的表註的是他個人的擬音。由此看出兩人的企圖不同，小川尚義註明古音的目的只是樹立一種方音比較的參考座標，而高本漢則企圖和古音擬測建立緊密的證據關係。從方音資料的立場來看，對照表提供了擬音的有系統的證據，但是從擬音的結果來看，對照表又變成了整篇論文的總結。高本漢的用心是很深的。

4. 說明文

小川尙義的 149 個對照表是依照古音音類而做成的，每一個對照表的前面都附上說明文，說明這個古音字類和今音對應的規則，從而看出閩南語，特別是廈門音在整個漢語中，共時的或貫時的關係、地位或特徵。

高本漢的對照表沒有附上特別的說明，他的說明分散在整篇的論文中。說明文可以說是高文的核心，高文最精彩的部分。文中高本漢不但說明了古音音類在現代漢語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的異同，並且企圖解釋如何從他所擬測的古音，變化或分化成現代音的理由。

(七)關於古今音對應表

小川尙義：依古音音類分聲母、韻尾、韻母三部分製成三個古今漢字音對應表。

高本漢：只有部分聲紐製作古今漢字音對應表，分散於各聲紐作為古音擬測的論證之一，韻母部分由方音對照表兼擔。

小川文的末節附了三個古今音對應表作為第一款漢字音比較研究的總結。三個表題為〈語頭音比較表〉：比較中古音和現代方音聲母的對應規律；〈語尾音比較表〉：比較中古音和現代方音韻尾的對應規律；〈韻音比較表〉：比較中古音和現代方音韻母的對應規律。比較的十三點和對照表大體上相同，不過閩南語只有廈門欄，漳州、泉州和廈門不同時附註於廈門欄內。又日本漢音、吳音部分不再用假名注音，而轉寫為羅馬字。

「比較表」的縱欄表示相同的古音音類和每一個現代方言或域外漢字音的對應規律。「縱欄」(古今音對應表)數比「對照表」(方音對照表)數不一樣，比較如下：

	對照表數	縱欄數
聲母	42	41
韻尾	12	6
韻母	75	59
聲調	20	0
合計	149	106

「縱欄」數和「對照表」數出入最大的是韻母和聲調部分。比較表沒有聲調

部分，韻母部分因以平賅上去入，所以入聲韻的比較沒有列入。比較表以《廣韻》平聲韻的順序排序，和對照表以《韻鏡》韻攝的順序排序不同，所以小川尚義在比較表韻母部分的縱欄欄首，都用 [] 注明了本文中內容相應的條項(相當於「對照表」的編目)，可以說是設想相當周到。

小川尚義的比較表作得相當仔細，除「普通的情形」之外，還考慮到古今音有條件的分化和條件不明的分化或文白異讀，以及對應規律例字的多寡。如〈語頭音比較表〉註明說：

「四號字表普通的情形，五號字表往往有的情形，六號字表罕見的情形，v 表俗音(白話音)。」(頁148)

又〈韻音比較表〉註明說：

「表中五號字表普通的情形，六號表稀有或特別的情形。」(頁155)

就是用字體大小來分別普通的對應或較少見的對應，或例外的變化。最大的字體表示普通的對應，較小的字體表示較少見的對應。小川尚義對那些較少見的對應，分三種方式處理：

1. 條件不明的分化 —— 沒有任何符號表示。
2. 有條件的分化 —— 用下平(聲調)、合口(介音)、庚、青、蒸(韻母)、見、曉、來、喻……(聲母)等表示分化的條件。
3. 文白異讀 —— 用斜體的 v 表示白話音。

高本漢也做了古今音對應表，不過只做了聲母部分，韻尾、韻母、聲調都沒有做對應表。

高文把中古聲母分爲 32 類，部分聲母分爲「單純」與「j 化」二種，共得 51 類。不過比較表只有 30 個表，影喻共用一表，泥娘共用一表。

高本漢的表只處理有「有規則的變化」，至於文白異讀，高氏在對照表中只收文讀音，對應表當然也只處理文讀音。上述條件不明的分化，高本漢都沒有列入表中，而在說明文的「例外」節中介紹，白讀音也被當作「又讀」音處理。總之，不論是方音對照表或古今對應表，都看得出高本漢企圖把它們處理得很「有規則」，以便「指明現代方言是怎樣從古音演變出來的」(〈緒論〉，頁 13)

高本漢的對應表，凡是有條件的分化都被放到表中，分化的條件一部分放在表中做爲表格區隔的條項，一部分只在說明文中說明。表中顯示的分化條件有：平仄(聲調)；一、二、三、四等；開口、合口(呼)。

關於比較點部分，高本漢不是逐點羅列，而是分類或分區羅列，比如北方官話的比較點特別多，對應規律都一樣，不遑一一列舉，統統列入「官話」欄內，

如果官話裡還有例外，就用括弧說明除外，如「官話(漢口、四川除外)」；如果絕大多數的方言都一樣，只列舉那少數不同的方言，再設一個「其他方言」欄，把對應規律相同的方言都包括進去。

比較小川尙義和高本漢的古今音對應表，不同的地方有：

1. 小川尙義的比較點一一列出，容易從表中查出個別方言的古今音對應規律系統的全貌；高本漢的表分區羅列，不容易查出個別方言的對應規律系統的全貌。顯示小川表製作的目的是爲了方言比較，高表製作的目的只爲了古音擬測。

2. 小川尙義作了聲母、韻尾、韻母三個對應表，缺聲調比較表，當時聲調資料缺乏，可以原諒，但古今音入聲韻的對應規則和舒聲韻不同，在韻母對應表中不列入聲韻顯然不妥。高本漢只作聲母部分。既作聲母對應表，而不作韻母對應表，體例上不太統一，原因大概是因爲高本漢覺得韻母古今音對照的功能，〈方音字彙〉的對照表已經夠承擔，不必再歸納出對應規律。也就是說在韻母部分，方音對照表和古今音對應表合併爲一。

3. 小川尙義的表，在表中所列的對應條件較多，高本漢只列等、呼，其他條件都被排除在表外，企圖使表中陳列的對應規律顯得很有規則。由此看出小川尙義的目的是爲了理解今音的全貌，高本漢則有意把古今音對應規律簡單化，以利於古音擬測的理解。

由以上幾點看出小川尙義的表和高本漢的表因爲目的不同，處理方式也不同。小川尙義的表是爲了方言比較而作的，高本漢的表則是爲了古音擬測而作的。

(八)關於古音擬測

小川尙義：只擬測聲母、韻尾部分，不詳細論證擬音理由。

高本漢：擬測了聲母、韻尾、韻母部分，詳細論證擬音理由。

如前所述，漢語中古音擬測是高本漢的目的，小川文的目的只是漢語方言比較，擬音不一定必要，不過比較語言學和歷史語言學具有辯證的關係，古音擬測自然需要比較方言，方言比較自然關連到古音擬測。

小川尙義的漢字音比較既以《韻鏡》爲古音的參考座標，已經足夠做爲比較的基礎，不過《韻鏡》的音系只是一個音類系統，而不是音值，無法據以理解古今音的變化或現代方言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小川在容易擬測的中古聲母、韻尾等輔音部分作了擬測，作爲理解今音的參考，並非沒有必要。只是擬音並非小川文的目的，所以小川尙義對於擬音沒有做繁複的論證與說明。這個古音擬測是和漢字音比較研究同時進行的，聲母、韻尾兩部分的比較研究即相當於擬音說明。

高本漢整本著作的目的就是爲了擬音，所以詳細的擬音理由說明文，成爲高文的核心部分。高本漢說：

「要想一個古音的擬測能夠成立，當然先得費好多工夫使它跟這個語言的歷史上的舊材料相合，其次還要能夠把中國全部方言（不只是一兩處方言）解釋到一種可信的程度。就是在每一個方言必得能找出通一套聲音演變的歷程，從語音學的觀點看都成可能的變化。」（緒論，頁4）

因此高本漢對於前人的擬音無論是否「正確」都採取批評的態度，擬錯了自然不用說，即使擬對了（和高氏結論相同），沒有說明擬音理由也只算是一種「猜度」，譬如有關曉、匣二紐的擬測，Maspero的意見和高本漢相同，可是高本漢並沒有一句讚美之詞，高氏批評說：

「Maspero定曉母爲清的舌根摩擦音x，匣爲相配的濁音 δ 。他對這種說法並無給一個理由，所以仍然算是一種猜度。我們在未徹底考究這個問題以前不能接受他。」（頁272）

由此可以看出高本漢如何重視擬音說明，擬音說明是否合理，是判斷「專家的科學」的擬音能否成立的一項標準。

用高本漢的標準來衡量，小川尚義的擬音到底只是一種「猜度」還是「專家的科學」的擬音呢？我們以爲小川的情形並不像高本漢所批評的前人那麼糟糕，因爲小川尚義的擬音都是伴隨著一個現代漢字音對照表的，對照表所羅列的資料本身就會說話，小川尚義所做的龐大的現代漢字音比較，本身就可以作爲他的擬音的很好的證據，何況小川尚義往往會簡單地說明擬音的理由。譬如他把二等知系和二等照系擬爲捲舌音，即說明是根據梵語對音；他把喻三擬爲-w；喻四擬爲-y即說明是根據安南譯音。還有他把全濁音擬爲：並b、定d、群g、從dz、邪z、床二dz、床三j、禪zh是根據吳語。他對於沒有自信的擬音也不強作解人，注“？”以示存疑。可見小川尚義的擬音說明雖然簡單，也是有相當根據而且很謹慎的。

擬音說明的詳略和擬音的科學與否沒有關係，像高本漢做了那樣冗長的擬音說明，也並不能保證擬音一定正確。從下面的比較可知，小川尚義的擬音可能比高本漢還合理。現在將小川尚義和高本漢都做過的中古聲母、韻尾部分的擬音列表比較如下：

	小川尚義	高本漢
聲母部分		

幫	p	唇音	p	
滂	p'	唇音	p'	
並	b	唇音	b'	
明	m	唇音	m	
非	f	唇摩擦音	f	
敷	f'	唇摩擦音(?)	f'	
奉	v	唇摩擦音	v	
微	v ⁿ	唇摩擦音	m	
喻二三	w	半母音		
端	t	舌尖音	t	
透	t'	舌尖音	t'	
定	d	舌尖音	d'	
泥	n	舌尖音	n	
精	ts	舌尖音	ts	
清	ts'	舌尖音	ts'	
從	dz	舌尖音	dz'	
心	s	舌尖音	s	
邪	z	舌尖音	z	
來	l	舌尖音	l	
知	ṭ	舌尖裏音	ṭ	顎爆發音，弱清
徹	ṭ'	舌尖裏音	ṭ'	顎爆發音，送氣清
澄	ḍ	舌尖裏音	ḍ	顎爆發音，送氣濁
娘	ŋ	舌尖裏音	ŋj	
照二	ts	舌尖裏音	tɕ	齒上塞擦音，弱清
穿二	ts'	舌尖裏音	tɕ'	齒上塞擦音，送氣清
床二	dz	舌尖裏音	dʒ	齒上塞擦音，送氣濁
審二	s	舌尖裏音	ɕ	齒上摩擦音，濁
照三	ch	舌面音	tɕ	顎塞擦音，弱清
穿三	ch'	舌面音	tɕ'	顎塞擦音，送氣清
床三	j	舌面音	dʒ	顎塞擦音，送氣濁
審三	sh	舌面音	ɕ	顎摩擦音，清
禪	zh	舌面音	ʒ	顎摩擦音，濁

日	zh ⁿ	舌面的鼻音	nz
喻	y	半母音	元音起頭，沒有爆發作用
見	k	舌根音	k
溪	k'	舌根音	k'
群	g	舌根音	g'
疑	ng	舌根音	ŋ
曉	h	喉頭音	x
匣	h	喉頭音，弱 h	ɤ
影	()	喉頭音	? 喉部爆發音

韻尾部分

緝合藥洽	p	p
侵覃鹽咸等	m	m
質物月曷黠屑	t	t
真文元寒刪先等	n	n
屋沃覺藥陌錫職	k	k
東冬江陽庚青蒸	ng	ŋ

以上聲母、韻尾的音序根據小川文原來的順序，這個音序是根據發音部位所做的順序，而不是《韻鏡》的順序。小川部分所用的音標、音值說明也遵照小川原文的用法。高本漢部分，音標根據譯本所用的國際音標，音值說明根據各章的說明文。

中古韻尾的音值自來就沒有什麼爭論的，高本漢和小川尚義的擬音也完全一樣，不必比較。現在來比較一下兩者有關聲母部分的擬音不同之處：

1. 高本漢在第一卷〈古代漢語〉將聲母分為 32 類，因部分聲母有 j 化現象，各分為二類，共 51 類，可是到第三卷擬音時，卻擬了 40 個聲母。多出來的八個是輕唇音四紐及照二四紐。非敷奉微四紐，高本漢認為是近古音，雖非中古音，也擬了音，又照系二等四紐也擬音，所以共擬了 40 個聲母。但喻母未分為二類擬音。

小川尚義把聲母分為 41 類，擬了 41 個聲母，喻母分喻三喻四，因此比高本漢多了一母，其餘兩者雷同。

喻三、喻四在反切或韻圖裡分得很嚴，喻四實際上是三等聲母，只是寄在四等罷了，高本漢把喻四歸為單純的一類，而喻三歸為 j 化的一類，顯然不對。喻三

和喻四在現代方言裡也表現了非常不同的行爲差異，既然重、輕唇音和照二、三都分別擬音了，喻三、四不分別擬音是不合理的。後來的中國聲韻學家都認為喻三、喻四應該分類，並爲之擬音。小川尙義把喻三、四分得很開，喻三擬爲 w、喻四擬爲 y，因此喻三放在微母之後，喻四放在日母之後。

2. 小川尙義把二等的知系和照二系統統擬爲捲舌音，說明是根據梵語對音。高本漢於照二系擬爲捲舌音，知系卻擬爲舌面音，顯然不對稱。李方桂批評說：

「知徹澄娘等母高本漢以爲是舌面前的塞音及鼻音。羅常培根據梵漢對音把這些聲母擬爲捲舌音 **retroflex** 或 **supradental**。就切韻音系的聲母分配情形來看，知徹澄娘等母跟照二穿二床二審二等捲舌音很相似，都可以在二等韻母前出現。但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照三穿三床三審三日等母都只能在三等出現。如果知徹澄等母是舌面前音的話，我們看不出來爲什麼跟同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的分配這樣地不一致。

再者，依高本漢的學說知徹澄娘跟照二穿二床二審二都是從上古的舌尖前音，受二等韻母的影響變來的，我們也找不出適當的理由去解釋爲什麼二等韻對於一種舌尖前音使他變成舌面前音如知徹澄等，對於另一種舌尖前音使他變成舌尖後音如照二穿二床二審二等。這種不同的演變在音理上也不易說明。因此我們決定把知徹澄娘等認爲是捲舌音，寫作 **t-**、**t'-**、**d-**、**n-**，以與照二穿二床二審二 **ʈs-**、**ʈs'-**、**ʈz-**、**ʂ-**，相配合。」

(1980：6~7)

3. 自十九世紀初 Marshman 以來，Edkins、Volpicelli、Schaank，以至小川尙義，每一位漢語音韻學家都認爲古代的全濁聲母是不送氣的，但是高本漢根據吳語濁音送氣（應是清音濁流）的性質，堅持認爲中古漢語全濁聲母是送氣的。李方桂對這一點評論說：

「切韻系統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高認爲是吐氣的，馬伯樂認爲是不吐氣的。近年來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少討論。至少在切韻時代濁母吐氣與否不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因爲只有一套濁母，這也跟藏漢系的語言如西藏話的情形相同。但是高本漢認爲濁母是吐氣的，所以引起他在上古音系裏另立了一套不吐氣的濁母，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他以爲不吐氣的濁母，後來在現代方言裏有變成吐氣的（如客家話，或北京話的陽平字等）在音理上不易解釋。他的理由並不充足，所以我們認爲切韻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都是不吐氣的 **b-**、**d-**、**g-**、**dz-** 等。」(1980：6)

由以上三點看來，李方桂是贊成小川尙義的意見了。高本漢對前人的這些修

正，到了後來還是被修正成前人的意見。

4. 小川尚義把曉、匣二母擬爲 *h*、弱 *h*，和高本漢以前的漢語學家如 *Schaank*、*Volpicelli* 非常相似，不過 *Schaank* 解釋：曉是很強的 *h*，匣是普通的 *h*，這些都沒有什麼根據。*Maspero* 定曉爲 *x*、匣爲 *ɣ*，高本漢根據日本吳音曉母譯爲 *k*，匣母譯爲 *g* 等理由證實了 *Maspero* 的說法，以後好像沒有人提出異議，這個說法算是成爲定論了。

由以上四點看來，高本漢在聲母擬音方面真正的成就只是證實了 *Maspero* 有關曉：*x*、匣：*ɣ* 兩母擬音的意見。高本漢有關聲母的擬音佔了 198 頁之多 (239~436)，才得到這一點成就，未免令人意外。

小川尚義和 *Volpicelli* 的聲母擬音，有一些類似之處，茲抄錄 *Volpicelli* (1896) 的擬音於下，以資比較：

見 <i>k</i>	溪 <i>k'</i>	群 <i>g</i>	疑 <i>ng</i>		
端 <i>t</i>	透 <i>t'</i>	定 <i>d</i>	泥 <i>n</i>		
知 <i>t(r)</i>	徹 <i>t(r)'</i>	澄 <i>d(r)</i>	娘 <i>n(i)</i>		
幫 <i>p</i>	滂 <i>p'</i>	並 <i>b</i>	明 <i>m</i>		
非 <i>f</i>	敷 <i>f'</i>	奉 <i>v</i>	微 <i>w</i>		
精 <i>ts</i>	清 <i>ts'</i>	從 <i>dz</i>	心 <i>s</i>	邪 <i>z</i>	
照 <i>ts(r)</i>	穿 <i>ts(r)'</i>	床 <i>dz(r)</i>	審 <i>s(r)</i>	禪 <i>z(r)</i>	
曉 <i>Hh</i>	匣 <i>h</i>	影 <i>*</i>	喻 <i>y</i>		
來 <i>l</i>	日 <i>j(r)</i>				

關於濁紐及知系、照系爲捲舌音，兩者相似。設想小川的擬音可能參考了 *Volpicelli*，至於以下六處不同，應當就是小川尚義個人的貢獻了：

1. *Volpicelli* 把微母擬爲 *w*，小川擬爲 *vⁿ* (鼻化的 *v*)。
2. *Volpicelli* 把娘母擬爲 *n(i)*，和知徹澄擬爲捲舌音不一致，小川一律擬爲捲舌音。
3. *Volpicelli* 不分照二、照三，皆擬爲捲舌音，小川分爲照二、照三，把照二擬爲捲舌音，照三擬爲舌面音。
4. *Volpicelli* 不分喻三、喻四都擬爲 *y*，小川把喻三擬爲 *w*、喻四擬爲 *y*。
5. *Volpicelli* 把日母擬爲 *j(r)*，小川擬爲 *zhⁿ* (舌面的鼻音)。
6. *Volpicelli* 依照韻圖傳統的音序，小川依照發音部位的順序。

Volpicelli 所參考的方言資料其實和小川尚義差不多，他曾自承其擬音是 *Parker* 在 *Giles* 大辭典裡所載的漢語方言資料的成果。可是顯然小川尚義的擬音

遠比 Volpicelli 的擬音更加高明。如果以李方桂(1980)的說法作為中古聲母擬音的定論的話，那麼小川尚義應該是漢語音韻學史上，第一位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成就最接近定論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家。茲錄李方桂的擬音於下，以資比較(以下的音序及標音根據原文)：

幫	p	滂	ph	並	b	明	m		
端	t	透	th	定	d	泥	n	來	l
知	t̚	徹	t̚h	澄	d̚	娘	ŋ		[捲舌音]
精	ts	清	tsh	從	dz	心	s	邪	z
照二	t̚s	穿二	t̚sh	床二	d̚z	審二	ʃ		[捲舌音]
照三	t̚s̄	穿三	t̚sh̄	床三	d̚z̄	日	n̄z̄	審三	ʃ̄
見	k	溪	kh	群	g	疑	ng	曉	x
影		喻三	j	喻四	ji			匣	ɣ

比較小川尚義和李方桂的擬音，除了曉、匣、喻三母之外，其餘沒有什麼大差別。小川尚義是日本人，竟不會利用日本吳音以考證曉、匣二母的音讀，令人扼腕。至於喻母的音讀，李方桂的說法也還有商榷餘地。其次的差別是李方桂不擬輕唇音，其原因大概如高本漢所說，輕唇音是近古的發展，中古沒有輕唇音。

由上述可見，古音擬測雖然不是小川尚義的目的，他對於擬音的理由也只是輕描淡寫，沒有長篇累牘的論證。可是他竟是最早成就了最接近李方桂較合理的聲母擬音的現代漢語音韻學家。他何以有這樣高明的見解？我們以為除了他個人的天份，應歸功於他所做的完整的現代漢字音的比較研究。

四、學術地位之比較

小川尚義：默默無聞，毫無影響力。

高本漢：現代漢語語言學的開拓者。

小川尚義的名字本來只有少數研究閩南語、南島語的學者知道，至於他在漢語語言學的成就知道的就更少了。依筆者所見，曾經撰文介紹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的業績的只有吳守禮(1955)、村上嘉英(1966, 1989)、洪惟仁(1992)數篇而已。小川在學術界的知名度主要是閩南語和南島語，漢語方面可謂默默無聞。

至於小川的影響力只限於殖民地時代台灣一般的閩南語及南島語研究者。通

觀整個日據時代的台灣語言研究，除了小川本人在閩南語、漢語方面的研究及小川在台北帝國大學期間與淺井惠倫合作對台灣南島語所做的研究之外，全部都限於實用的目的，幾乎可以說沒有學術性的研究。因此雖然當時編纂台灣話讀本的人不少，但他們都奉小川為一代宗師，所有教科書的音韻說明，差不多都抄襲小川尚義在《日台大辭典》和《台日大辭典》的音韻說明。小川終其一生沒有編過一本台灣話教科書，但卻有一些台灣話教科書請他「校閱」，從此也可見得他在台灣話研究地位的崇高。不過小川尚義在日本本土是毫無名氣、也無任何影響力，在中國更不必說，原因留到下文分析，總之事實是如此。

但是高本漢就完全不同，高本漢不但名滿天下，而且影響力非常大，可以說是「現代漢語語言學之父」的地位。

高本漢是西方漢學家之中，論文中譯本、日譯本最多，介紹他的學術成就的文章發表得最多的一位學者。光是本文所參考的文章介紹高本漢的，中文的就有十篇，日文的有二篇。以下讓我們來看一看學者們對他的評價。

最先將高本漢介紹給中國的是羅常培，羅常培 1935 年以羅莘田的筆名發表〈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以最大的篇幅介紹高本漢，並給與最高的評價，他說：

「……西洋人對於中國音韻學的研究到了高本漢總算是集大成了！」

「照比較語言學演進的先例來講，高本漢所擬的切韻音，乃至詩經音，雖然還得經我們大大的修訂，可是同史黎紘(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擬『原始印度日耳曼語』(die Indo-Germanische Ursprache)的功勞是一樣的。」

其次是張世祿 1937 年發表〈高本漢與中國語文〉，對高本漢的成就有更詳細而全面的介紹。他說：

「我們切不可忘記，他是把中國語文學成為科學化最大的功臣，在這個新時代裏，他最足以代表西洋研究中國語文學的專家。」

王力 1963~64 年發表《中國語言學史》〈西歐漢學家對中國語言學的影響〉一開始便說：

「西歐漢學家研究漢語，跟中國傳統的漢語研究大不相同。他們都經過了普通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的訓練，懂得語言是一個系統，懂得古音可以重建等等。拿西洋的語言學理論來指導漢語的研究是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然後以很大的篇幅詳細評介高本漢的業績，雖然對高本漢提出很嚴厲的批評，但是他也承認：

「……能不能說中國聲韻學沒有受高本漢的影響，或只是受極微弱的影響呢？我們不能這樣說，因為當時的中國學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漢的總原則，甚至接受他的觀點、方法，然後從枝節的地方去糾正他，甚至比他更走得遠些。」

「高本漢對漢語音韻學的影響，其積極方面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至於日本，如下所述，日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也是從1937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日譯本序云：

「高本漢教授對中國語文的學術的研究及中國文獻的科學的批判貢獻甚大，早為識者所承認。如有名的語言學者耶斯波森在其主要著作中引用了教授的業績，導出重要結論，而極口稱讚。」

儘管如本文所分析的，高文無論是有關古音系統、方言資料、或擬音結果，都有些錯誤，可是高本漢對漢語語言學的貢獻不是因為他沒有錯誤，而是因為他把描寫語言學和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方法介紹到漢語語言學來，對中國、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漢語語言學（不止音韻學）有極大的影響，他實際上開創了現代漢語語言學這一點，是任何一個漢語語言學史家不敢否認的事實。因此筆者以為高本漢實在堪稱是「現代漢語語言學之父」。有人封趙元任先生為「漢語語言學之父」（參見周法高1987），但筆者以為趙先生宜稱「現代漢語語言學之母」。理由是：

(1) 趙先生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實際推動者，現代中國漢語學家幾乎都是趙先生的徒子徒孫或追隨者所建立的。他是實際哺育現代漢語語言學的人，這樣的地位是「母」的地位，不是「父」的地位。

(2) 高本漢發表高文在1915年，而趙先生發表第一本中國人寫的方言調查報告《現代吳語研究》是在1928年，兩者相差13年。雖然高文中譯本晚至1940年才出版，但是高文甫發表立即受到全世界漢學家的討論。傅斯年在高文〈序〉中說：

「瑞典高本漢先生所著之中國音韻學研究，始刊於民國四年，至十五年而完成。在其前三卷出版後，頓引起列國治漢學者之絕大興趣，我國人士治語文之學能讀法文者，亦無不引為學術上之幸事。蓋其綜合西方學人方音研究之方法與我國歷來相傳反切等韻之學，實具承前啓後之大力，而開漢學進展上之一大關鍵也。」

這句話明白地肯定高本漢開創現代漢語語言學的功勞。這樣的功勞當然是「現代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的地位。雖然高本漢不是中國人。

關於高本漢和趙元任的對比，何大安(1993.9)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民國以來，漢語方言的研究，隨著新的學術課題的開展，有了新的面貌。大致來說，高本漢和趙元任是帶來新面貌的兩個關鍵人物。他們兩個人的學術興趣，支配了半個世紀以上的絕大多數的方言研究。」(頁5)
這樣的關係，豈不是現代漢語語言學之「父」和之「母」的關係嗎？

現在我們要來研究一下，為什麼小川尚義同樣受過現代語言學的訓練，在高本漢1915年發表《中國音韻學研究》的八年前就發表過相當傑出的漢字音比較研究與中古音擬測，甚至有些地方做得比高本漢好。可是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界默默無聞，他的研究發表之後，無人重視、毫無影響，正如沙漠中的一朵花，無人欣賞，花謝之後也沒有結果就寂寞地枯萎。為什麼「現代漢語語言學之父」不是小川尚義，而是高本漢呢？

以下我們從學術史的觀點，分為「學術知名度」和「學術影響力」兩方面來分析、解釋其原因。

1. 學術知名度方面

台灣這個小島雖然曾經被稱為「美麗島」，但是當它隸屬中國的時候，它只是一個不重要的邊陲之地，被中國看做是「鳥不語、花不香」的地方。所以當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就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日本得到台灣並非事前經過周密的研究、計畫而得到的，只是因為忽然戰勝才把台灣收為戰利品的。可是既然得到這塊新領土，日本就有心把它好好的經營，所以初期派到台灣的領導者，很多是一流的統治人才。以學務部來說，像伊澤修二、伊能嘉矩、神津仙三郎、小川尚義都是非常優秀的。

殖民地台灣對日本而言雖然是一塊新領土，可是台灣總督府統治之下的台灣，其實等於是一個獨立國，台灣和日本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有獨立的法律和司法系統。初期台灣總督府的一批領導官員是奇異的存在，他們充滿了帝國主義的夢想，具有相當好的學養與能力，希望並且有相當的自由在這塊新天地一展鴻圖，他們在台灣的業績，無論政治的或學術的，在許多方面都超過日本本土的水準，可是他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認識。其原因分析如下：

(1) 日本人對台灣的漠視

日據時代所謂的「內地人」(日本人)對台灣非常生疏，台灣這塊殖民地對日本而言是邊疆蠻荒之地，甚至是外國。日本人對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從來不曾關心過，台灣總督府無論對台灣人民進行了殘忍的殖民地統治，或造就了什麼了不起的統治業績，對於日本人而言等於是國外的事情。至於國外的事情，日本人更

關心的是中國、滿洲、朝鮮，而不是台灣。馬淵東一在〈追悼小川尙義教授——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1945)即憤慨地批評日本「中央學界」對台灣學界的故意忽視。

戰後，台灣變成真正的國外。日本人無論政治家、學者，極少關心台灣的事情，日本曾經統治台灣半個世紀的歷史，幾乎已經被日本人忘記了。至於日本殖民地時期所發生的歷史、人物，即連一般的漢學家、中國通也不關心，更不了解——除了極少數的例外。

以早稻田大學教授六角恆廣先生為例，他是大家公認傑出的中國語學家，1961年他出了一本名著《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在這本書中，台灣話被歸入中國語之中，可是台灣話只佔5頁的篇幅，並且發生嚴重的錯誤，他竟說「台灣最通行的中國語方言是閩南語，其次是廣東語、客家語」。他不知道戰前日本人在台灣所謂的「廣東語」就是「客家語」。他把民間學者伊澤修二捧為戰前唯一科學地、實證地研究中國語的學者，但是對語言學者小川尙義不說一句話。

其實呢，伊澤修二只是比其他的門外漢所謂中國語教材編者多懂得一些語音學的知識，他並沒有做過純語言學的漢語研究。要說戰前日本唯一的漢語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然而研究伊澤的專著、專文連篇累牘，研究小川的鳳毛麟角，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伊澤主要的中國語研究、出版是在日本進行的，而小川尙義主要的漢語研究與出版是在台灣進行的。

戰後日本朝野仍然普遍有一種重中輕台的傾向，台灣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還不如香港。

台灣研究在日本是一門極冷門的學術，而研究殖民地時代台灣的學者更少。也許殖民台灣五十年的歷史對日本人而言是一個不道德的紀錄，日本人不願意提起它。其次，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日本人更是不敢把台灣和中國分開提起，於是更加地重中輕台。舉例來說：

1986年波多野太郎編成出版《中國語學資料叢刊》，其中第一篇四大册收官話白話研究38種，第四篇第三、四卷收漢語方言研究25種，有上海話14種、蘇州話1種、山東話1種、漢口話1種、南京話1種、粵東(?)1種、廣州話2種、汕頭話1種、海南話3種。沒有一本台灣話。

1991~93年六角恆廣編成《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收了137種中國語教科書，其中台灣話及福建話只收5種，其餘全部是官話讀本。依序言，這個集成可以當成是前述波多野太郎(1986)的補編，看出特別收了5種閩南語是為了糾正波編的不足。

可是台灣話的教科書不只這5種，依陳恆嘉編、洪惟仁補(1992.1)日治時代台灣閩南語著作122種，台灣客語3種，大陸閩南語5種，共有130種之多，這還只是日文著作。閩南語著作汗牛充棟，光筆者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993.2)總論中所介紹的辭書就有69種之多。我們雖然還沒有蒐集完全所有的漢語方言教科書，並作比較，但是依上面的數字看來，閩南語的和中國官話的教科書的數量應該相去不多。閩南語所以這麼受重視的主要原因是閩南籍華僑在南洋的重要性，及日本曾經直接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因素。

但是台灣被歸在中國之中，台灣的一切在中國的名下都縮水了，台灣的成就必須和台灣在中國的領土比例相配合，即使台灣的成就和中國的總成就相當，也必須把台灣的成就削減到台灣在中國的領土比例的程度，龐大的台灣話教科書只能選取極少數作品作為「中國語」教科書的陪襯。日本人的重中輕台，即基於這種政治的偏見。

日本從世界「中原」的歐美看來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疆」，而殖民地台灣從日本看來更是「邊疆」。「邊疆」日本的學術都不受世界的重視，「邊疆的邊疆」台灣怎會受到重視？再加上台灣在中國又是「邊疆」，日本人之不重視台灣可說是理所當然的事。

(2)殖民地台灣的階級隔閡

在台灣日本人基本上是統治階級，他們的一切業績當然是為了天皇服務，而不是為台灣人民服務的。總督府的政策，在政治上排斥台灣人的參政權、在經濟上壓制台灣資本家的出頭、在教育上只為了同化台灣人為日本人及培養具生產能力的台灣人，所以殖民地時代的日本人和台灣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階級，日本人是統治者、台灣人是被統治者，互相對立，互不關心。

總督府研究台灣話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日本人台灣話的能力，以方便其統治與教育，並不是為了尊重或保存台灣文化。小川尚義這些學者從來不想培養台灣人作為研究接班人，而台灣人對於小川們的研究也幾乎一無所知。一九三〇年代發生鄉土文學論戰時，那些主張台語文學的戰士們正在為台語文字化的困難而裹足不前時，似乎不知道南管文學和歌仔冊的存在，也不知道日本人已經替台灣話創造了假名注音符號和整理了統一的漢字系統，也不知道大量的台語辭典、台語專門雜誌和台語教科書可能給與台語文字化多大的參考價值；而統治者一方的台語研究者，當然也不會給與戰士們任何理論上或技術上的支援。

換言之，殖民地時代台灣的日本人和台灣人雖然同處在一個島嶼上，卻是兩個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台灣人知識份子不知道小川尚義這個人似乎也是自然的

事。

(3) 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視

台灣對中國來說一向都只是一個「邊疆」，「邊疆」台灣的一切不僅中國不重視，即連在台灣的人都不重視。中國人故意忽視台灣的心態較之日本殖民者之忽視台灣更加嚴重。日本統治者雖忽視台灣人的權利，卻相當重視台灣研究。中國的統治者不但忽視台灣人的權利，更忽視台灣研究。

戰後，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歷史變成被人拋棄的歷史。這段歷史不但不歸入「中國史」，也不歸入「日本史」，即連中國人所寫的「台灣史」也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解嚴前，台灣的統治者，爲了徹底讓日本在台灣人的記憶中消失，把日據時代台灣史的研究幾乎弄成政治上的禁忌。台灣人只有咒罵日本殖民者的自由，一旦肯定日本殖民者的業績就會背負「親日派」、「奴才」的罪名；如果是日本人，情形也差不多，日本人研究者只有爲這段歷史「反省」的權利，而沒有肯定的權利。村上嘉英《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1966)一文在介紹了一段在台灣日本人閩南語研究的業績之後，也不忘加上一句這樣「自清」的話：「筆者毫無禮讚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的意思，但是由上觀之，日本人在台灣的閩南語研究，也許應該在漢語研究史上具有一席之地吧。」

殖民地台灣的這段歷史既不歸中國史也不歸日本史，如果它再不歸台灣史的話，它不知道是那一國的歷史了。殖民地時代在台灣日本人，直到近年台灣史開放研究後被新一代的台灣史家「收容」以前，真是一群世界史的孤魂野鬼了。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的歷史，不但是台灣人的痛苦經驗，也是在台灣日本人的悲哀。

基於以上三點理由，我們認爲作爲殖民地台灣統治階層的一份子，小川尚義的學術知名度所以只限於在台灣日本人的統治階層之內，不爲台灣學界所知，不爲日本學界所知，不爲中國學界，當然也不爲世界所知，其實毋寧說是一種歷史的宿命。

2. 學術影響力方面

一個學者的學術影響力牽涉到學術風氣和學術水準兩個問題。沒有傑出的學術表現當然不可能有學術影響力，但是光有傑出的學術表現，也不一定會有學術影響力，因爲這又牽涉到學術風氣的問題，歷史上多的是生前受到漠視，死後才受肯定、甚至受盡崇拜的學者，也有生前受盡崇拜，死後罵名滿天下的學者。前者是因爲他的學說或業績不合時宜，無人願意接受，或者太過前進，時人無法接

受，可是死後學術風氣改變了，學術水準提升了，人們才回頭來肯定他的價值。反之就是後者了。以下分析小川沒有學術影響力的原因：

(1)日本「支那語」學界的實用主義

日本戰前稱中國為「支那」，所謂「支那語」和「漢文」有不同的意義和地位。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有傳統的「唐通事」，專門教授南京話、福州話、漳州話，這唐通事的職業是世襲的，所採用的教學法也是傳統的經驗教學，口耳相傳，沒有什麼理論分析。明治維新以後，這種現象並沒有什麼改變，改變的只是世襲的家傳教育改為學校、補習班教育而已。但是英、法、德語的教育則完全不同，所採用的是有語言學根據的教育法，不但有發音說明，而且有文法分析。這當然是因為當時的現代漢語語言學尚未萌芽，可是直到第二次大戰以前，中國已經發展了現代漢語語言學，日本的中國語學界仍然沒有發展出什麼科學的漢語語言學研究。(10)

教育方面，甚至在正式的學校教育，所謂「清語」所受的重視也不及英、法、德語，1873年成立的「東京外國語學校」的清語科，到1883年廢校，清語和朝鮮語、露西亞語一起被驅逐出來，歸入「東京商業學校」。「清語」或「支那語」教育主要由民間補習學校在進行。為什麼日本政府對中國語這樣輕視呢？六角教授有這樣精闢的分析，他說：

「從明治初年起，上面對中國語的態度一直是不想為中國語培養出中國語學，可以說一直要使它庸俗化。學問的出路被堵塞，日本的中國語一直被壓在實用語的地位，在學校教育之中被排斥在角落裏，不承認其文化性……，在這種情形下，不可能產生科學地研究中國語的學習者與研究者。」(1961: 15~16)

那麼為什麼一直把中國語當作實用性的語言呢？六角教授解釋說：

「中國語所謂實用性和英、德、法語的實用性有很大的不同，英、德、法語雖也具有實用性，但有文法的、語音學的語言學的基礎，在實用的方面，語言學發生了作用，但是中國語只有實用的方面，沒有語言學的基礎。……」

「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沒有文化的意義，只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目的。對那些在這種關係之下活動的人來說，中國語只是必要的工

(10)有關日本的中國語研究史，主要參考六角恆廣(1961.12)。

具。」(頁17)

在此，六角教授是沒有把台灣的小川尚義的業績考慮進去，小川尚義對漢語及台灣語言的研究是有相當深刻的語言學基礎的，語言學在實用中發生了作用。可是六角教授沒有注意到小川的成就。

六角先生說得沒錯，近代以來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沒有文化的意義，即使直到今天，日本人學習中國語也仍然只有經濟的、外交的目的，文化的目的只限於少數學者特別的興趣。沒有文化目的的語言研究很難產生語言學的研究風氣。

另外，脫離語言的書面語研究也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語言學的研究。日本的漢學研究其實已經有非常長久的歷史，但是不過止於書面語的研究。尤有進者日本人把中國的古文稱為「漢文」，這漢文對日本人來說並不是外國文，寧可說是日本文的古文，就像中國各種方言的人把漢文當成古文一樣。明治時代的日本上下對這「漢文」相當尊敬，尤其是儒教的經典及漢詩(古詩)。可是日本文人讀漢文的時候一開始便翻譯成日文，叫做「訓讀」。經過翻譯的漢文訓讀和漢語沒有密切的關係，日本人讀漢文不需要懂漢語，也就是說「漢文」脫離了「漢語」而存在。因此雖然日本的漢文研究有悠久的歷史，但是沒有漢語的語言學研究。

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應該從1937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集《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通觀戰前的日本中國語學界，可以說沒有足以稱為漢語語言學的學術研究。日本學術界的漢語語言學研究可以說是由1946年10月20日「中國語學研究會」成立開始起步的，然後日本的漢語語言學界以更大的視野與努力，作出不遜於中國、或台灣的，蓬勃、而高水準的研究。

戰前日本的中國語教育界，如前所述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侵略相始終的，無論是政府或民間，需要的只是速成的、實用的「支那語教育」，而不要求更精緻的、更科學的語言學基礎，科學的漢語語言學研究缺乏生長的环境，這是為什麼戰前的日本未曾有漢語語言學發生的歷史原因。

在戰前的這種背景下，小川尚義的這篇漢語比較研究遂成為戰前日本人唯一的一篇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然而這篇論文竟然被附在《日台大辭典》的緒論裡，小川在寫過這篇論文之後沒有再寫過其他的漢語語言學論文，當時也沒有其他的日本人跟著寫出什麼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從這點可以看得出一個偉大的學者是需要良好的學術環境、學術風氣來培養的。小川在總督府裡只是一名小小的編修官，台灣總督府聘請小川來學務部的目的只是編台灣語辭典，而不是作學術研究。⁽¹¹⁾說穿了，在台灣日本人的台灣話研究雖然遠比日本本土日本人的中國語研究成績輝煌，但是同樣受到實用主義的學術風氣的限制，在那樣的環境下，

漢語語言學的學術研究無法成長。

小川在總督府任職期間，雖然有關語言學的學術研究一直在艱苦中進行，可是一直沒有得到當局的支持鼓勵，也未曾受到日本本土「中央學界」的青睞，⁽¹²⁾學術的小川尚義心理的孤獨與鬱卒是可以想見的。

(2) 中國的漢語語言學無求於日本

小川尚義的漢語研究不但在日本的漢語學界毫無知名度、毫無影響力，對中國的漢語學界同樣也毫無知名度、毫無影響力，這一點差不多是不證自明，不言而喻的。我們可以設想出這樣的理由：

①小川尚義發表論文的1907年，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是斷絕的，當時台灣與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交往，往往是同時在日本留學的機會。如前所述，無論是在日本的日本人或在台灣的台灣人，對於台灣總督府的隔閡都很深，對於小川尚義的閩南語研究極為陌生，對其漢語研究更加陌生，所以中國的留學生不可能透過台灣人或日本人了解小川尚義的漢語研究。

②如前所述，戰前的日本並無所謂學術的漢語研究，但是在中國，現代漢語語言學雖然尚未萌芽，中國傳統的聲韻學到了清末卻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研究成果。相對的日本的漢語學界並未有過出名的傑出表現，因此中國的漢語學根本無求於日本。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各方面的文化進步神速，日本積極侵華以前，因地利之便，中國留日學生絡繹於途，可是唯獨漢語語言學方面，似無留日學生，蓋基於這個認識。戰後日本漢語語言學雖然勃興起來，但因中國實行鎖國政策，直到近年改革開放以前，極少留日學生，研究漢語語言學者更未有所聞。

至於台灣方面，戰前留日者似乎也沒有研究漢語語言學者，戰後台灣留學以美國為主要方向，研究漢語語言學的早期留學生中，留日的只有王育德博士一人而已，而王育德從未回台灣任教或服務過，台灣的語言學界對王育德相當陌生。而王育德對小川尚義也不太注意。

中國或台灣對日本的漢語語言學的進步幾乎毫不關心，即使關心，也因不懂日文，無法了解其實際，因此即使戰後日本漢語語言學有了相當可觀的成就，卻自成流派，沒有外國人理會，對台灣及中國的漢語語言學沒有什麼影響力。

③中國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透過高本漢把歐洲的語言學介紹進來的，近代

(11) 有關台灣總督府研究台灣話的目的，參見村上嘉英(1985.3)、洪惟仁(1992.9)。

(12) 馬淵東一用語，參見馬淵東一〈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

的中國，不但在物質文明方面遠遠落在歐洲之後，即使是中國人自己的漢語研究也已經遠遠不及歐洲人了。因此年輕的漢語語言學家所需要的是透過西方的語文，特別是法文、英文（高本漢的論文大部分是這兩種主要文字所寫的）學習歐洲的語言學。歐洲已經成為世界的「中原」了，是衆所注目的學術中心。小川尚義的研究雖然是緊緊跟著西方最進步的漢語語言學，可是他是孤獨的研究，他和西方的學者或西方的漢學團體不相往來，沒有一個西方的漢語學家注意到他的存在。因此唯西方是尙的中國年輕漢語學家當然也沒有人知道小川尚義的存在了。二十世紀以來的學術如果不能引起西方學者的注意，即意味著脫離了學術的「中原」而註定了默默無聞，這幾乎是「邊疆」學者的宿命。這也說明了現代「邊疆」學者爭相以英、法、德文，尤其是英文發表論文的理由。

總歸一句話，在日本帝國主義以外交、軍事、貿易、殖民地統治掛帥的實用主義的學風之下，科學的漢語語言學沒有生長的土壤，加上現代學術「中原」的西移，台灣成了「邊疆」的「邊疆」。因此儘管小川尚義的學術研究無論在研究方法上或研究成果上，在當時世界的漢語學界是頂尖的成就，在東方，那樣的研究也是破天荒的事，可是歷史的捉弄，迫使小川尚義成為無人理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悲劇英雄。

五、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

漢語是一種單音節的孤立語，文法上沒有明顯的形態變化，因此表意的漢字通行數千年之久竟不必廢棄。漢語、漢字這種不必語音分析的特色，使得漢人天生的缺少語音的自覺。因此漢語語音學以訓詁、文字方面的研究最先發達，中國聲韻學是因佛教的東來，受印度聲明學的影響才發達起來的。其次由於漢字表意特性的限制，使漢人研究漢語音有一個天生的缺陷，就是缺少標音的工具，從南北朝沈約等人發現四聲到清末的古音學研究，中國聲韻學竟是在一種沒有音標的情形下發達起來的。沒有音標做為記錄、討論的工具，漢語聲韻的分析就只能做到「音類」的分析，而做不到「音值」的描寫，在這種基礎下所做的研究，都是抽象的，註定了中國聲韻學發展的侷限，而這種侷限只有等待歐洲的語言學來突破。

歐洲語言學的發達和帝國主義的發達有相當的因果關係。由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商業帝國主義到英國的工業帝國主義擴張侵略，加上基督教的傳教活動，財富的聚積與資訊的蒐集，因緣際會，使得歐洲成為是近代文明的「中

原」。近代語言學也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發達起來的⁽¹³⁾。

英國統治印度之後，使得 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發現了梵語和歐洲的語言間的近似。1816年 Franz Bopp(1791~1867)以純粹語言學的方法證明了印度梵語與歐洲語言的血緣關係，因而誕生了印歐歷史比較語言學，也同時誕生了語言學。

同時，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也開始在東方萌芽，先是 Marshman 1809年的論文從漢梵對音，為古漢語擬出一套濁聲母 b、d、g，並指出漢語、暹羅語、藏語、緬甸語的關係。然後漢語方言辭典紛紛出版，1817年基督教新教東傳的開拓者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出版官話音的《華英字典》，1837年基督教新教傳教師麥都思(W. H. Medhurst, 1796~1857)出版漳州音的《福建方言字典》。從此以後，漢語方言字典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而集方言之大成者，先是 Williams 1874年的字典蒐集了四種方音，其後 Parker 在 Giles(1892)的大字典裡蒐錄了11種方言，為當時的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Volpicelli(1896)及小川尚義(1907)的研究就是根據這些材料所做的。漢語語言學的研究可以說是這樣地經過一世紀的資料累積而慢慢地學術化的，而當小川尚義、馬伯樂、高本漢把較發達的印歐語言學研究法引進到漢語語言學之後，才能稱為科學的研究，而誕生了「現代漢語語言學」。

然而集漢語方言調查與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大成者是高本漢。高本漢比前人的條件優渥的地方，是當時的描寫語言學已經相當進步，雖然國際音標尚未誕生，但是各種系統的語音符號已經足以有效的作為描寫語言學的工具。高本漢在《研究》序中明確的說：

「我所以選擇這個題目，有一種特別的情形。差不多沒有哪一國的方音研究能像瑞典那樣進深的。在前一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就曾經有過一番很有效果的工作，是用最新的方法來分析瑞典各種語言，並且曾經有很

(13) 同樣是帝國主義，可是帝國主義可以幫助西方學者作學術的漢語語言學研究，在日本却成為阻礙漢語語言學進步的原因，這是為什麼？我們以為這原因有兩個：

- (a) 日本對中國文化研究的興趣已經被漢文的研究所滿足，日本對現代中國缺少文化研究的興趣。而西方對中國文化或中國現況，不分古今，都充滿著神秘感與研究興趣。
- (b) 歐洲文化中自古即有實事求是、追求根源、邏輯思考的哲學傳統，帝國主義的擴張提供大量的資訊，幫助哲學家蛻化為科學家。東方文化中缺少這些文化的基因，很難發展出高度抽象化的學術。

美滿的結果。我現在就是提議用我們瑞典的方法來研究直到現在還未經十分墾植的中國聲韻學。」(頁1)

其次，在高本漢以前，研究中國聲韻學的西方學者多半是業餘從事的，而高本漢卻把它當成一項專門的學術來研究。而最重要的是中國聲韻學自來就已相當進步，只是缺少一種描寫語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而無法突破發展瓶頸而已。高本漢就是這樣善用傳統中國聲韻學的既有成就，引進了西方進步的語言學方法，以專門的訓練，嚴密的音標系統，加上專業的精神，勤學的工夫，開創了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紀元。

高本漢引進西方語言學的新方法以解決中國聲韻學的功勞，是無人敢否認的。但是我們應該注意：

1. 自從1816年Bopp建立印歐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到高本漢發表《中國音韻學研究》的1915年，已經一百年。這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並非高本漢所獨創，也不是高本漢第一個將這種方法引用到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在高本漢以前曾經有許多學者做了漢語比較研究，只是他們的研究不及高本漢認真、專業，因此也缺少學術性。可是在肯定高本漢集大成的貢獻的同時，不能忘記高本漢以前的學者的鋪路之功。如果沒有Volpicelli或Schaank，恐怕也不會有高本漢吧。

2. 方言調查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作，高本漢再怎樣精力充沛也不可能把所有漢語方言調查完全，高本漢的調查偏重北方，南方及域外音多半採用別人的二手資料，尤其是「業餘的」字典編纂者的資料，如果沒有這些「業餘的」研究者的奉獻，高本漢的成就恐怕是有限的。

3. 高本漢只是知名度最大、影響力最大的一位西方漢語學者，這不是說高本漢已經達到不能再超越的成就，所謂「前修未密，後學轉精」，高本漢超越了前人，而後人也不斷對高本漢提出批判與修正，這毋寧是歷史之必然。高本漢對漢語語言學的貢獻，並不是提供了正確的方言資料或提出了一套正確的結論，而是以實地的研究，把西方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引進到漢語語言學來，開闢了一條漢語語言學的新道路。

一門學術的成立不是一蹴可幾的。高本漢以前的研究者，即使被高本漢批評得體無完膚，每一個曾經對漢語語言學的進步有貢獻的人都應該有他的歷史地位。因此現在我們想從漢語語言學史的觀點，對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的成就做一個評價。茲列述如下：

1. 雖然小川尚義不為西方學者所知，但是他對西方學者的研究非常了解，他緊緊跟著時代的步伐前進，他的漢字音比較研究，在當時是走在時代的尖端。我

們知道中國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1928年趙元任發表《現代吳語的研究》才開始的；至於日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戰後的1946年「中國語學研究會」成立以後的事。可是小川尚義在高本漢的論文(1915)未出現以前的1907年，即發表了這篇漢字音比較研究。也就是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而且不論在中國、日本或歐洲，小川尚義都堪稱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最前鋒。

2. 高本漢的漢語方言調查、漢字音比較研究，開創了漢語方言學的科學研究，可是高本漢只做到了單字音的調查研究，所謂漢語方言學的研究，說穿了是爲了古漢語單字音的擬測服務的，這一點很長久地限制了漢語方言學的發展方向。直到近年來，漢語方言學界才逐漸注意到詞彙、語法、方言類型學、方言地理學、方言社會學的問題，而萌芽了真正的漢語方言學。可是小川尚義一直都是結合了音韻與詞彙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的比較研究並非爲了擬測古漢字音服務的，他的漢字音比較研究是純粹的漢語方言學研究。他在同書(1907)所發表的〈台灣言語分佈圖〉也是第一張漢語方言分佈圖，並且比後來發表的任何一張台灣語言分佈圖都詳細而精確。小川在整個漢語語言學界簡直是一個特異的存在，他可以說是純粹站在漢語方言學的立場作漢語方言比較研究的第一人。

3. 小川尚義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還可以蒐集更多更正確的資料做得更精密一些，可是這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張漢語主要方言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在小川尚義以前沒有任何人做過。小川沒有做好的，後來者，做爲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礎工作，這是必須做的。可是自來漢語學界只有個別方言的古今音比較表，做過所有漢語主要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古今音比較表的，直到目前爲止也只有小川尚義做得最完全，高本漢雖然也做了一些，但只做了部分聲母、韻母部分，〈方音字彙〉雖然也可以算是古今音比較表，但不能算是古今音對應表。也就是說，在漢語方言古今音比較的全面研究這方面，至今還未有人超過小川尚義的成就。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而令人遺憾的事。

4. 雖然古音擬測不是小川尚義的主要目的，可是他是第一個進行全面的漢語方言比較的人，他以語音比較進行聲母、韻尾擬測的研究方法和高本漢是一樣的，他所擬測的結果，從現在看來，竟比高本漢更合理。而小川文發表的年代(1907)比高文(1915)早了八年。當然就整個格局來說，高本漢無疑地更宏偉而影響深遠，可是我們不能不佩服小川尚義的真知灼見。

基於以上四點理由，我們認爲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不能不佔有一席之地。他被歷史所埋沒，不是因爲他的研究在當時水準不夠，而是歷史的捉弄。

【謝啓】

本文在日本交流協會「專門家長期招聘事業」資助下寫成。在日本天理大學研究七個月間，承蒙天理大學提供必要協助，並承天理大學教授村上嘉英先生、前田均先生熱心指導。回國後，又蒙中央研究院龔煌城先生、羅仁地先生、張炎憲先生，及吳壘彬先生等親切教示；刊出前又承蒙審查先生提供修正意見，使本文增加了討論深度、避免了許多錯誤，謹此一併致謝。又本文「節要」，已在清華大學1994年「中華民國聲韻學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謹此說明。



N. Kalgren

高本漢遺像



小川尚義遺像(攝於1936年獲學士院恩賜賞)

「孃」母ノ二等、三等ニ屬スル音、及ビ「照」、「穿」、「牀」、「審」母ノ二等ニ屬スル音是ナリ、「アイテル」氏ノ梵漢辭書ニヨレバ、梵語ノ舌尖裏リシゲアル音ヲ表ハス場合ニ於テ、多クハ、如上字母ニ屬スル文字ノ用井ラル、コトヲ見ル。

ア、(t)音、韻鏡「知」母ノ二等、三等ニ屬スル(t)音ハ、廈門音ニ在リテハ、普通(t)音ヲ有ス、汕頭音、福州音、客人音(?)モ、亦此ノ特徴ヲ有シ、安南音ニ在リテハ、普通(tr)音ヲ有ス、但シ廈門音ニ在リテ、稀ニ(ts)音ヲ有スルモノアリ、又時トシテハ、讀書音ニ(t)音、俗音ニ(ts)音ヲ有スルモノ、(汕頭音?)、或ハ讀書音ニ(ts)音、俗音ニ(t)音ヲ有スルモノアリ。(ナリ、(v, h)俗音ノ記號。以下準之。)

廈門	汕頭	福州	客人	廣州	上海	溫州	寧波	南京
tiang	tong	ting	chung	chung	tsung	ciung	ciung	chung
中 <small>陟隆切 漢音チュウ</small>	?	ting	chin	ching	tsang	tsing	tsing	ching
貞 <small>知盈切 漢音テイ</small>	?	ti	ti, chi	chi	tsz	tsz	chz	chi
知 <small>陟高切 漢音チ</small>	?	tsuan, v. tung	chon	chim	tsz	tsz	chzi	chwen
轉 <small>陟衰切 漢音テヌ</small>								

附圖一 小川尚義現代漢字音對照表

日臺大辭典緒言

一五五

支 寘紙	江 絳講	冬 宋腫	東 送董		蒸庚江東 等青陽冬 ^{ng}	職陌覺屋 ^k 錫藥沃
i (4. 7)	ang (3. 7) ong (3. 4)	ong (2. 7) iong (2. 4)	ong (1. 7) iong (1. 4)	廈 門	ng n	k, t v, p
i	oung {ung ōng	ung üng	ung üng	福 州	ng	k
i	ong {ung ong	ung {ung iung (見,曉來)	ung {ung iung (見,喻)	客 人	ng n (庚,青,蒸)	k t, p
i	ong {ōng long	ung ung	ung ung	廣 州	ng	k
i ū (知,照) 'rh, i (日)	ong ong	ung {ung iung (曉)	ung ung	上 海	ng	k h
i ū (知,照) ng, n, zz (日)	oa üoa	ung {iung üoa iöe (來)	ung {iung iöe (來)	溫 州	ng, 母音	母音
i ū (知,照) êrh, ng (日)	{ōng üong (見) ōng	ung {ung iung (照) iung (曉)	ung {iung ung (見,來)	寧 波	ng ñg	h
i 'rh (日)	{ang iang (見,匣) wang	ung {ung iung (曉)	ung ung	南 京	ng	h
i ī (知,照) êrh (日)	{ang iang (見,匣) wang	{ung êng (非) ung iung (曉)	{ung êng (幫,非) ung	北 京	ng	母音
i ii (見,曉) ā, i (日)	ang ang	ong {ong ung iung (曉)	ong ung	朝 鮮	ng	k
i	{ang iang (見) ong	{oung ong (非) ung ong (來)	oung ung	安 南	ng	k
i	au au	ou you	ou yuu	漢 音 日	u	ku ki (e-)
i	ou ou	uu yuu	uu you		吳 音 本	u

韻音比較表

〔表中五號字ハ普通ノ場合、六號字ハ稀有
又ハ特別ノ場合、○ハ本文ノ條項ヲ示ス〕

附圖二 小川尚義古今漢字音對應表

通攝平上去

689

例字 古音	62 封 pji ^w oŋ	63 峯 p'ji ^w oŋ	67 逢 b'ji ^w oŋ
高麗	poŋ	paŋ	poŋ
漢音 ¹³	ho:	ho:	ho:
吳音 ¹³	fu:	fu	bu
安南 ¹⁴	fəŋ	fəŋ	fəŋ
廣州	fəŋ	fəŋ	fəŋ
客家	fəŋ	fəŋ	fəŋ
汕頭 ¹⁵	hoŋ	hoŋ	hoŋ
福州 ¹⁶	huŋ	huŋ	huŋ
温州 ¹⁷	fəŋ	fəŋ	vəŋ
上海	fəŋ	fəŋ	vəŋ
北京	fəŋ	fəŋ	fəŋ
開封	fəŋ	fəŋ	fəŋ
懷慶	fəŋ	fəŋ	fəŋ
歸化	fəŋ	fəŋ	fəŋ
大同	fəŋ	fəŋ	fəŋ
太原	fəŋ	fəŋ	fəŋ
興縣	fuə̃	fuə̃	fuə̃
太谷	fə̃	fə̃	fə̃
文水 ¹⁸	xū	xū	xū
鳳台	fəŋ	fəŋ	fəŋ
蘭州	fə̃	fə̃	fə̃
平涼	fəŋ	fəŋ	fəŋ
西安 ¹⁸	fəŋ	fəŋ	fəŋ
三水	fəŋ	fəŋ	fəŋ
四川	fəŋ	fəŋ	fəŋ
南京	fəŋ	fəŋ	fəŋ

在所有以下各攝，方言中用 -p, -t, -k 收聲的字其實用的都是不爆發的“閉音”，嚴格寫起來應該作 kəp, kət 等等。這個聲明過一次我們以後可就從簡作 kəp 等了。在山西南京上海的入聲字收尾是一個喉部的閉音，並且元音大半是短的（短的程度各方言不一樣）這個提過了一次，我們以後就不寫 taʔ, iəʔ 等等而簡作 ta, iə 等等，讀者可以記住凡是這些方言的入聲字是促收的。在懷慶入聲字大半亦有喉塞音。閩粵方言中也有這種音的入聲字；在這些方言的入聲字，凡是我們寫作元音收尾的都得認作實在是以 ʔ 音收尾，例如‘插’汕頭 ts'a 是當 ts'aʔ 講。在閩方言往往 -p, -t, -k 有的人或有時候讀成閉音 ʔ。

(16) 福州去聲 -əyŋ, -ouŋ, 所以：‘共’ kəyŋ, ‘塞用’ əyŋ, ‘擁湧’ əyŋ, ‘重’ təyŋ, ‘縱’ təkəyŋ, ‘頌誦訟’ səyŋ, ‘奉’ houŋ², ‘棒’ houŋ。另外有些 -uŋ 跟(去聲) -aəŋ: ‘恐’ huŋ*, ‘冢寵’ t'uŋ*, ‘濃’ nuŋ*, ‘縱*蹤’ təkəuŋ, ‘聳’ suŋ; ‘共’ kaəŋ*, ‘重’ taəŋ*。

(17) 温州 -(i)uŋ, 除表中所注外，還見於：‘恭供甘’ kuŋ*, ‘雍擁鎔庸容’ iuŋ, ‘松’ suŋ*。

(18) 文水 西安跟在 -uŋ 韻一樣，元音也是跟着聲調變的，看前註 4, 5。

附圖三 高本漢現代漢字音對照表

266

歷 史 上 的 研 究

餉興縣，蘭州；固始，廈門；轟平陽，鳳台，客家，廈門；愷廈門；瓊南京；鄱固始；笏南京；享平陽；嚮，嚮，迄，喧廈門；嚮日本，廈門；旭固始，南京；廈門。

聲母 6: 匣 (共 157 字)

這個古聲母普通是拿 h , h^1 , φ , f , k 這些音來讀的, 或者失去 (○)。

關於 x 跟 φ 的精密音值請看聲母 5 曉。這些音的分配可以從下列的表看出來:

	一 等		二 等		三等跟四等	
	開口	合口	開口	合口 ¹	開口	合口
廣州	h	h^2, \bigcirc	h	h^2, \bigcirc	h^3, \bigcirc	h^1, \bigcirc
客家	h	f	h	f	h	f^4, h
四川	x	x 跟 f^5, x	x^6, φ	x	φ	x^4, φ
官話 (四川除外) 揚州	x		x^6, φ	x	φ	x^1, φ
汕頭, 廈門	\bigcirc^7, h				h	
福州, 安南, 高麗	h					
吳語	h					
日本	k					

1. 宕攝的二等字很早 (見聲母 1, 見) 就從合口變到開口裏頭去了; 關於它們的聲母見開口的那類。

2. 在這個方言的 $u\eta, uk$ 韻母前頭讀 h (洪, 紅, 鴻, 斛, 饜, 熊)。

3. 在這個方言的 a 元音前頭讀 h (奚, 系, 俠)。

4. 在蟹攝的字 (惠, 慧) 裏頭讀 f 或 h 。

5. 在這個方言的 u 韻的前面 (胡) 有 h 跟 f 兩讀。

6. x 開口: 衡到處皆是; 鞋山西 (除去太原跟鳳台), 陝西, 甘肅, 漢口 (又

附圖四 高本漢古今漢字音對應表

參 考 書 目

日文部分

カールグレン

- 1937 《Karlgrén 支那言語學概論》。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東京：文求堂書局發行。收入高本漢三篇著作：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ses,” 1923, 英文版。(Ordet och Pennan i mittens Rike, Stockholm, 1918 荷文版)
— 〈支那語の音韻と文字〉, 頁 1~13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1926, Oslo。(挪威：人類文化比較研究所叢書之一)
— 言文學と古代支那, 頁 137~306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 1928, London。(倫敦：中國學會演講錄)
— 支那語のローマ字表記法, 頁 307~341。
- 1949 〈中國の言語〉。大原信一、つじい哲雄、相浦たかし、西田龍雄合譯。1958, 東京：江南學院發行。全書 229 頁。
高本漢著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譯文部分, 頁 1~116。

G・ムーナン

- 1970 〈言語學の時代〉, 收入《言語學とは何か》, 頁 23~37。福井芳南、伊藤晃、丸山圭三郎共譯。東京：大修館書局。
《ソシユ — ル — 構造主義の原點》。福井芳南、伊藤晃、丸山圭三郎共譯。東京：大修館書局。

上田萬年

- 1896 《言語學》講義。新村出筆錄、柴田武校訂。1975 年, 東京：教育出版株式會社。335 頁。

三並 良

- 1935 《日本における自由基督教と其先驅者》。東京：文章院。

小川尚義

- 1903 〈廈門語に就て〉, 《言語學雜誌》4~6。
1906 〈台灣語について〉, 《台灣協會會報》90。
1907 〈日台大辭典緒言〉, 收入《日台大辭典》, 頁 1~212, 台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發行。全本收入洪惟仁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 1993。
1909 〈フアポラング語について〉, 《言語學雜誌》10。
1931~32 《台日大辭典》。台灣總督府。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七~八冊。

小島武味

- 1981 〈小川尚義こと — 初代國語學校教授〉, 載《台灣への架け橋》。日本茨木市：蓬萊會關西支部。

山田孝雄

- 1935 《國語學史要》。收入「岩波全書」, 1943 年單刊發行。

中國語學研究會

- 1957 《中國語研究史》。東京：江南書院。180 頁。

中國語學研究會

1969 《中國語學新辭典》。東京：光生館。

六角恆廣

- 1961 《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東京：播磨書房。277頁。1984年，東京：不二出版社再版。
 1968 《中國語關係書目》。早稻田大學語學教育研究所。104頁。
 1988 《中國語教育史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局。
 1991～93 《中國語教本類集成》。東京：不二出版社。

仁田義雄

1989 〈日本語學史〉，收入《日本語概説》第十章，頁307～332。

台北帝國大學言語學研究室

1935 《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説集》。語言部分主要由小川尚義記音、撰文，淺井惠倫負責中部及蘭嶼。東京：刀江書院。

台灣教育會

1939 《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編者發行。正文1098頁，年表71頁。

永島榮一郎

1941 〈支那語學と云うもの〉，《中國文學》74。

石田幹之助

1942 《歐米における支那研究》。東京：創元社。

石 剛

1993 《植民地支配と日本語》。東京：三元社。231頁。

田中秀夫

1969 〈新村先生を悼む〉，《言語研究》54。日本言語學會發行。

吉野秀公

1927 《台灣教育史》。台北：著者發行。580頁。

伊澤修二

- 1895 《日清字音鑑》。東京：著者發行。1900年，再版。
 1904 《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東京：著者發行。
 1904 《視話應用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説書》。東京：著者發行。
 1915 《支那語正音發微》。東京：著者發行。正文473頁。

安藤彦太郎

1955 《中國語教育の歴史性格》。早大政經學部「教養諸學研究」二。

西田龍雄

1958 〈B. Karlgrenの業績と漢語學〉，收入《中國の言語》。東京：江南書院。

佐藤源治

1943 《台灣教育の進展》。台北：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發行。正文276頁，年表42頁。

村上嘉英

- 1966 〈日本人の台灣における閩南語研究〉，《日本文化》45：62～108。
 1973 〈伊澤修二のこと〉，載竹內好《日本と中國のあいだ》。「文藝春秋」出版。
 1985 〈舊植民地台灣における言語政策の一考察〉，《天理大學學報》144：22～35。
 1989 〈日本人在十九世紀末期對台灣閩南方言音韻的研究工作〉，《天理大學學報》160：27～40。

金田一京助

1939 〈國語學史と上田萬年先生〉，《中國語學》4(1)。

周斌武

1987 《漢語音韻學史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61頁。

長志珠繪

1993 〈言語學の「受容」〉，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59：228～247。

波多野太郎

1986 《中國語學資料叢刊》。東京：不二出版社。

酒井亨

1994 〈小川尚義——ある偉大な台灣語學者と故郷・松山〉，《ふおるもさ》1994.8：1～8。

時枝誠記

1933 《國語學史》。收入「岩波講座」《日本文學》。1940，單刊發行。

倉石武四郎

1941 《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東京：岩波書局。

馬淵東一

1945 〈追悼小川尚義教授——故小川先生とインドネシア語研究〉，《民族學研究》13(2)。收入《馬淵東一著作集》卷三，頁485～500。

埋橋徳良

1991 《伊澤修二の中國語研究》。日本長野縣：銀河書局。160頁。

陳恆嘉(編)、洪惟仁(補)

1992 〈日治時代台語著作目錄〉，《台語文摘》1(總25)：36～39。

陳恆嘉

1993 《日本の領台期における台灣語教育と研究の一考察》。台北：東吳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魚返善雄

1937 〈支那言語學の任務と方法〉，《中國文學月報》24。

國府種武

1931 〈台灣における國語教授の變遷〉，《言語と文學》3：51～94、4：83～119。

1931 《台灣における國語教育の展開》。台北：第一教育社。

1936 《台灣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の過去と現在》。台北：台灣子供世界社。

1939 《日本語教育の實際》。台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台北支店，542頁。

野村雅昭、小池清治(合編)

1992 《日本語事典》。東京：東京堂。

蔡茂豐

1977 《中國人に對する日本語教育の史的研究》。東京教育大學博士論文。

中文部分

王力

1963～64 〈中國語言學史〉，原載《中國語文》1963(3～6)、1964(1～2)

(即總124～129期)；合訂本1967年5月《中國語文》印行；1981年8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訂單行本；1972年4月，台北泰順書局重刊繁體字版；1987年7月，板橋駱駝出版社重刊繁體字版。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編委會

1991 《中國語言學大辭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174頁。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9(1/2)：1~61。198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吳守禮

1955 《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著者油印發行。

1970 《台灣省通誌人民志語言篇》。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何耿鏞

1984 《漢語方言研究小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何大安

1993 〈從中國學術傳統論漢語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4)：713~731。

林語堂(譯)

1923 〈答馬斯貝囉論切韻之音〉。原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1(3)：475~498，收入林語堂《語言學論叢》，頁162~192。

周法高

1987 〈憶李方桂先生〉。《書和人》582。

周斌武

1987 《漢語音韻學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高本漢

1915~26 《中國音韻學研究》。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合譯。194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731頁

邵敬敏、方經民

1991 《中國理論語言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洪惟仁

1992 〈日據時代的台語教育〉，《台灣風物》42(3)：49~84。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頁1~12。台北：武陵書局

1993 《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10大冊)。台北：武陵書局

1993 〈日據時代的辭書編纂〉。《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五冊，頁12~26。台北：武陵書局。

張世祿

1937 〈高本漢與中國語文〉，《語文月刊》1(5)。收入1984《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選集》，頁176~184。上海：學林出版社。

張世祿(譯)

1937 《漢語詞類》。商務印書館。

黃弗同(主編)

1988 《理論語言學基礎》。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秀敏

1994 〈日本學者對台灣南島語研究的貢獻〉。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台灣南島語民族母語研討會」發表論文。

董同龢

1964 《漢語音韻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58年，八版。

1981 〈高本漢的詩經研究〉。《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集》，頁307~312。〈近三十年的中國語言學〉，頁371~382。丁邦新編，台北：食貨出版社。

蔡培火

1969 〈本人對台語註音符號工作的經過〉。《國語閩南語對照辭典》序言。台北：正中書局。

羅常培

- 1931 《廈門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4。1975年，古亭書局複印。
 1934 〈漢語方音研究小史〉，原刊1934年，《東方雜誌》31(7)。收入《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選集》，頁142~156。

羅莘田

- 1935 〈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東方雜誌》32(14)：35~45。

西文部分

Doi, Toshio

- 1976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Japan*.《日本言語學外史》Tokyo：Shionozaki Shorin。

Douglas, Carstairs(杜嘉德)

-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Chang-Chew & Chin-Chew dialects*. 倫敦：Glasgow 出版。俗名《廈英大辭典》，台北：古亭書局複印。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Doty, Elihu

- 1853 *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Amoy dialect*.《英華廈腔語彙》Amoy, 214 pp.

Eddkins, J.

- 1853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1857 *A grammar of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1871 *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London.
 1874 *Old sounds*. Inserted in Williams(1874).

Giles, Herbert A.(翟理斯)

- 1892 *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華英大辭典》Shanghai. 1912 second edition, revised and enlarged. 正文 1710 pp.

Karlgren, B.

- 1915~26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Leyde, Stockholm, and Göteborg*. 898 pp.1930 北京影印，題為《中華語音學研究》。
 1922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漢語中古音的擬測〉*T'oung Pao* 2 (21)：1~42。
 192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中日漢字音分析字典》Paris。
 1923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中國語與中國文》London。
 1926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語文學與古中國》Oslo。
 1928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漢語上古音當中的幾個問題》*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pp.769~813。
 1928 *The Romanization of Chinese*.《漢語羅馬字拼音論》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24pp。
 1931 "Tibetan and Chinese,"〈藏語與漢語〉*T'oung Pao* 28。
 1932 *Shi King Researches*.《詩經研究》BMFEA4。
 1933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漢語詞族》BMFEA5。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中日漢字形聲論》BMFEA12。

- 1949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中國的語言》New York : The Ronald Press.
- 1954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中古及上古漢語語音學簡論》Stockholm.
- Marshman
- 1809 "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引自 Volpicelli(1896).
- Maspero, H. (馬伯樂)
- 1912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EFEO* (*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 l'Extreme Orient*) : 12.
-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 - ngan sous les T'ang," 《唐代長安方言》*BEFEO* : 20.
- Medhurst, Walter Henry(麥都思)
- 1837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 《福建方言字典》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Macao, China.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三冊。
- Möllendorff, P. G. von(穆麟德)
- 1899 *Classification des dialectes Chinois.* Ning - Po.
- Schaank, S. H.
- 1897~98 "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 *T'oung Pao* : 8(1) (1897) : 361~377, 8(2) (1897) : 457~486, 9(1898)28~57, 新 2(3)(1902) : 106~108.
- Schlegel, G.
- 1872 *Sinico - Aryaca.* Batavia.
- 1882~90 *Nederlandsch - Chineesch woordenboek met de transcriptie der karakters in het Tsiang - Tsiu Dialekt.* 《荷華文語類參》四卷 Leiden : E.J.Brill.
- Volpicelli, Z.
- 1896 *Chinese phonology, an attempt to discover the sound of the ancient language and to recover the lost rhimes.* Shanghai, 38pp.
- Williams, S.W.(衛三畏廉士甫)
- 1874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 - F - ang - Yuen - 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漢英韻府》Shanghai :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滬邑·美華書局).1903 second edition.

A Comparison of Research on Chinese Phonology By Ogawa And Karlgren

**With A Critique on Ogawa's Position i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Ui-jin Ang

ABSTRACT

Karlgren's monumental work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15~26) has no doubt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phonology and dialectology. He reconstructed the sound values of Middle Chinese on the basis of 33 Chinese dialects, Sino-Japanese, Sino-Korean, and Sino-Vietnames.

However, before Karlgren, a similar effort had already been made by a Japanese scholar, Ogawa Naoyoshi, as early as 1907. He conducted broad research comparing the sounds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Sinoxenic characters by means of modern linguistics. He reconstructed the phonetic values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and final consonants and, in some respects, achieved more reasonable results. This was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has two main goals. One is to compare the studies on Chinese phonology made by Karlgren and Ogawa, particularly on phone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phonological comparison; the other is to explain why Ogawa has been ignored, in spite of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we regard Karlgren as superior to Ogawa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honetic values of Middle Chinese, as well as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However, in terms of research results, there are some respects in which Ogawa is superior to Karlgr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Ogawa was the first scholar to study Chinese using modern linguistic methods, and therefore his position as a pioneer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deserves to be recognized.